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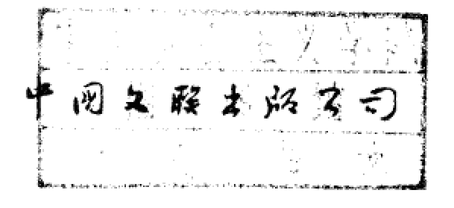
端木与萧红

钟耀群 著

端木与萧红

钟耀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端木与萧红/钟耀群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ISBN 7-5059-2802-3

Ⅰ.端… Ⅱ.钟… Ⅲ.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Ⅳ.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2408号

书　　名	端木与萧红
作　　者	钟耀群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奚耀华
责任印制	董华
印　　刷	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1千字
印　　张	5
插　　页	14页
版　　次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100册
书　　号	ISBN 7-5059-2802-3/I·2089
定　　价	1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一 、 闻 名

1932年，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在北平参加了“左联”,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化名“辛人”设信箱和鲁迅先生通信，寄“左联”小报《科学新闻》等刊物给鲁迅先生。1935年底，他参加“一二·九”学运,“一二·一六”第二次大游行后，只身跑到上海。

1936年，在当时文学前辈的热情关怀下，在《文学》、《作家》、《中流》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成了一名独具风格的青年作家。

他在北京的时候，就听说青年作家萧军、萧红在鲁迅先生的扶持下，出版了“奴隶丛书”《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还知道叶紫也是“奴隶丛书”的成员之一。他就是怀着找鲁迅先生的心情到上海的。没想到只通了几次信，连面都没见到，鲁迅先生就去世了。当时端木的心情是很沮丧的。不过，他也知道要当一个作家，最主要的还是写出好作品来。因此，他白天黑夜地在一个木匠铺的小楼上写文章。

创作之余，端木喜欢到他住处附近的法国公园去散步，在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彩，看树上的小鸟飞来飞去，绝不串门，也不爱找人聊天，可以说完全是

独处。这是他从小就形成了的孤僻性格。不过在同学和朋友来找他时，他也还是很高兴、很随和的。

一天，他正独自抱着膝盖坐在草地上遐想，突然听到远处有笑语声传来，他随着声音转过头去，看到有三个人从林荫道边说边笑地走出来转向公园大门走去。两男一女，男的一高一矮，一瘦一壮，女的穿着花格裙子，小皮靴，笑声主要是从女的口中传出的。端木目送这三人走出大门，思想里马上和“奴隶丛书”联系起来。因为听说萧军萧红也住在法租界附近，心想这三个人可能就是萧军、萧红和叶紫。

二、见面

自从鲁迅先生逝世后，茅盾先生意识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自觉地肩负起鲁迅先生的未尽事业。那时一些青年作家都聚集在茅盾先生周围，端木也是其中的一个，参加了茅盾先生组织的“日曜会”，每逢星期一，便在“新雅”酒楼聚会，互相交换上海当时文学界的情况，同时也可以从茅盾先生那里得到指导和教益。

“七七事变”时，端木正在青岛。他是应南开中学同学饶斌之约，到青岛海军俱乐部度夏洗海水浴的。他突然接到茅盾先生的信，要他马上回沪。他立即告诉饶斌，便买了船票回上海了。他曾在茅盾先生家楼上亲眼看到敌机轰炸，闸北大火。商务印书馆、华美印刷所正被大火燃烧。当时端木还不知道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和茅盾先生的《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正在华美印刷所排版，是徐调孚先生从燃烧着的华美印刷所里抢救出来的。当时茅盾先生要把《科尔沁旗草原》稿子交给端木自己保存。端木想到自己从来都是丢三拉四的，还是放在茅盾先生处保险，便没有接过来。后来还是茅盾先生交给开明书店出版

的。

由于战火迅速漫延，上海一些文学刊物都被迫停刊。这时胡风准备筹办一个刊物，便约端木参加。当时到会的有艾青、萧军、萧红等10来个人。这是端木第一次见到萧红和萧军，因为都是东北人，很快就谈到一起了。尤其萧军是辽宁省的，关系就更近了一层。当萧军萧红知道端木到上海已经一年多了，萧红便睁着一双大眼睛奇怪地问：

“我们怎么没听到老胡说起过你呢？要不我们早该认识了。”

端木笑了笑，没有吭气，同时接过萧红为他端过来的茶。

在会上，胡风提议刊物的名字就叫《抗战文艺》。萧红不喜欢这个名字，便说：“这个名字太一般了。现在正‘七七事变’，为什么不叫《七月》呢？用‘七月’作抗战文艺活动的开始多好啊！”

端木听了，很同意这个意见，心想，萧红不愧是北方女性，有一股质朴豪迈的味道。不过看到她老练吸烟时的样子，又想到这大概就是女作家的派头。之后，端木在胡风召集的组稿会上，也还见过萧红一两次，不过萧红不主动找他讲话时，他是不会主动找别人说话的。

不久，上海文化人多半去武汉了。和端木同住的杨体烈也回四川了。胡风还没有走，就要端木住在他

家去，彼此有个照应。端木便搬到胡风家一间小屋里住下了。

当晚，胡风拿来一双旧的咖啡色皮拖鞋给端木穿，有一只已经绽线了。胡风解释说，这双拖鞋是瞿秋白住在鲁迅家时，亲自买回来穿的。瞿秋白走后，鲁迅一直穿着它，所以有的地方都开线了。

端木本来是最不爱穿拖鞋的。这是他在 1937 年写的《哀鲁迅先生一年》的文章里，说得很清楚。但他一听这双拖鞋是瞿秋白和鲁迅先生穿过，便肃然起敬了。因此，不但在胡风家穿着它，临走时，还向胡风索取了它，保存了它。直到“ 十年浩劫 ”才失去了它。

那时，端木三哥的女朋友刘国英，也住在上海亲戚家。“ 八 • 一三 ”后，她父亲来信要她立即到武汉去。刘国英就要端木送她上火车。因为战乱，火车非常拥挤，端木去送她时，她在上海的一个男朋友也去送刘国英。端木看到那男朋友老对刘国英献殷勤，就很不乐意，横眼看着他，将刘国英的东西从那男的手中夺过来递到火车上大声说：

“ 你快走吧，到了武汉赶快给三哥写信！”意思就是告诉那位男士，刘国英是我哥哥的，你少来献殷勤！吓得刘国英也不敢和那位男士多说话了。

端木的哥哥们都非常关心这个小弟弟，随时都来信告诉他，到哪儿就可以找到他们。端木这时风湿病

犯了，行动不太方便，便决定到浙江上虞他三哥那里去住，至少生活上有人照顾他。因此在胡风决定去武汉时，端木便乘火车到了上虞。

端木三哥那时在上虞税务局工作，端木去了，也有个落脚之处。住了不到 10 天,三哥从单位带回茅盾给端木的信，信上要端木和他一起去湖南，他在萧山大饭店等他。端木行动不便，便立即要三哥代他去萧山饭店看茅盾，告诉茅盾他目前的身体情况。三哥便去了，回来告诉端木，萧山饭店被炸，茅盾先生已经走了，没见到。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端木行动稍稍恢复了，便接到萧军从武汉的来信，要他马上动身去武汉，胡风、艾青、聂绀弩等都已到武汉，正在为新办刊物《七月》写文章，就等他了。信很热情，是用文言文写的，还附了一首旧体诗。本来就不想再养病的端木，收到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后，就再也住不下去了。不听三哥的劝阻，立即收拾行装，要三哥为他买票，次日便乘火车去武汉了。

三、相交

端木到了武汉，雇车直奔信上的地址：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下车付了车钱，提着箱子正要叫门，门忽然开了。端木还没缓过气来，便听到一个欢叫的声音喊到：

“萧军，你看谁来了？”

原来开门的正是萧红。她本来是出去购物的，没想到开门却见到了端木。

萧军一边问是谁，一边往外走，见到端木，也欢叫起来，连忙接过端木手中的箱子，问端木收到他信没有？

端木高兴地说“：要不是收到你的信，我怎么下了火车就直奔这儿来了？”

萧红也高兴地说“：没想到信到的这么快！”

端木和萧军萧红在上海，只是在胡风主持筹办的《七月》组稿的座谈会上见过几次，虽然都是东北人，也没有什么更密切的往来。倒是抗日战争开始，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那时，小金龙巷内，萧军萧红住一间房，房内一张大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些零星东西。这间

房是向住另一间房的蒋锡金借的。端木看到这儿没有他住的地方，稍稍休息后，就准备去找三哥的女朋友刘国英，到她家里去住。

萧红挽留他道“: 别走,咱们住一块,有事也好商量。老胡、老聂他们天天都来，还有艾青、田间。蒋锡金一人住一屋，我要他给你挪个地方，搭张床就行了。”

萧军说“: 别去麻烦他了,就睡我们这屋吧。好在天冷，这张床又大，我睡中间，萧红睡里边，你睡外边，保证你不会摔倒地上。”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端木有些犹豫。

萧红说：“你要怕摔着，你睡里边好了，我睡外边。”

萧军说“: 你睡外边更好,免得在我们身上跨过来跨过去的。”

萧红白了他一眼,提起包,对端木说“: 我去买些好吃的，算是给你接风。”便高高兴兴地出去了。

这时进来了一个青年，萧军为端木作了介绍，这就是房子的主人、诗人蒋锡金，正在武汉办一个名叫《战斗》的刊物，还组织“时调社”的活动。蒋锡金欢迎端木的到来，并要端木能为他办的刊物写稿。

不一会儿，萧红买了酒和一些熟食回来，把桌子挪到床边就开餐了。端木不会喝酒，但在他们热情招待下，也喝了一点，脸却红到了脖根上。

萧红笑着说“端木不会喝酒,却好象是喝得最多的一个，多冤！”

这是端木第一次和萧红在一起吃饭，他没想到萧红竟比两位男士还能喝酒。他们边吃边聊，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如何写出最富战斗力的作品，号召人民起来，狠狠打击侵略者。

端木谈到他想当战地记者的愿望，萧红接茬说：

“你腿有风湿病，可当不成战地记者。”

端木说：“这可是我在南开中学时的向往。”

正谈得热闹，忽然进来一位穿着长衫的瘦高个儿，他们都高兴地招呼他，蒋锡金马上出去为他拿进来一张椅子。

萧红为端木介绍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聂绀弩，我们都叫他老聂。”

聂绀弩握住端木伸出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便说：“在上海就听说了，见面还是头一回。”

萧红忙张罗说“坐下,坐下,老聂,剩下的这点酒就归你了。”说着，就斟满了一杯酒，放在聂绀弩面前。

大家谈得更欢了，直到夜深，聂绀弩才回去，蒋锡金也回屋休息。

那时，端木上身穿着皮茄克，下身穿灯心绒马裤，高筒马靴，这是他从小就爱好的打扮，在一群流亡青年中，这种洋打扮，还是会引来一些非议，尽管嘴上

不说，心里总有一些看法，何况端木一贯是我行我素呢 。

这三位东北老乡端木年龄最小，临睡的时候，萧红知道他犯有风湿病，还为他烧了热水烫脚，给他在床里铺了被子，要他早早地到床里边躺下了。而萧军和萧红为了洗脚和睡哪一头，还争论了一番。端木由于乘火车太累，很快就睡着了，他俩什么时候上床都不知道。

第二天，蒋锡金不知从那儿借来一张小床，放在他屋里，就要端木搬过去和他一起住了。

过了没多久，小金龙巷又搬来一位“鸽子姑娘”的女画家，是蒋锡金的朋友。由于萧红的安排，要端木将小床让给女画家，晚上又和萧军萧红睡到了那张大床上。等到端木困极了，脱了外衣在床里面躺下的时候，萧红常常穿上端木的长筒皮靴，披上端木的皮茄克，极有兴趣的在屋里走两转，有时手上还夹着香烟，摆个姿势说：

“要有照相机,拍个照,多帅!”

端木转过身来，看着傻笑。

萧军又笑又骂：“快脱下来吧！真成了假洋鬼子了!”

端木觉轻，常常容易失眠，但迫于形势，也不得不这么住。

按理说，应该两位女士睡一屋，三位男士睡一屋，

这就方便多了。不过，萧红这样安排也自有她的道理，也许是想给蒋锡金和那位画家姑娘一些谈心的方便呢。何况端木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已经和萧军萧红睡过一张床了。他们这些热血青年是非常纯洁的。好在没多久，这位女画家就不知去向了，他们住处又恢复了原样。

那时候，小金龙巷住处，上午就是萧军、萧红和端木在写文章，吃饭时间有时到外面吃，有时买回来自己做，一般是萧军采购，萧红掌勺，端木涮碗。到下午就热闹起来了。胡风为了按期出《七月》而忙着组稿，来得很勤，聂绀弩、艾青、田间等都是常客。这里几乎都成了各地来的进步文化人的集中地了。

胡风每期都要端木交一篇稿子，发表在《七月》上。《七月》是半月刊，每月逢一、十六出版。在这期间，端木写了《哀鲁迅先生一年》、《记一二 ·九》、《寄在战争中成长的火枪手们》、《八一三抗战的特质》、《文学的宽度、深度和强度》等散文和论文。几乎每期都有端木的文章。

萧红对端木说，她很喜欢端木写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而且不止一次地说鲁迅先生活着的时候能互相认识就好了。端木就可以见到鲁迅先生了……。

端木三哥的女朋友刘国英是独生女，九岁就死了母亲，父亲又娶了后妈。在天津时就和端木的三个哥

哥都熟悉，抗战开始后，刘国英从上海随父亲到了武汉，在武汉大学念书。端木住小金龙巷后，刘国英和同学窦桂英经常去小金龙巷玩，和端木说，要看看作家什么样儿？端木便将萧军萧红介绍给她们认识。萧红见到她们还是有说有笑、问长问短的，萧军不怎么爱答理她们，穿双木板鞋。拍嗒拍嗒的走出走进，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因此，刘国英她们都喜欢萧红。来看端木的时候，总看到端木桌上床上乱糟糟的，就边笑他，边替他清理屋子。萧红见了，也和刘国英一起取笑端木。有时到中午了，就一起出去吃牛肉面。包括刘国英在内，谁身上有钱谁请客。

有一次，刘国英从学校来，告诉他们学校排了一个话剧，叫《前夜》，准备近期演出，她在里面还扮演一个姨太太，学生们都挺有兴趣，结果不知怎么的，导演这个戏的同学突然不见了，戏也演不成了。

端木心里不由动了一下：日本鬼子都打进来了，对学生还搞这一套。

就在端木发表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和《记一二 · 九》文章后的一天下午，两个女学生来找萧红谈创作，萧军和端木在屋里写东西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了两个人，手上还拿着条子，问：

“谁是萧军？”

萧军一抬头“：干什么？”

那人问“：谁是端木……良？”

端木马上想到刘国英说的学校停演的事，知道来者不善，便说：“我就是！”

那人转身对萧红：“那你就是萧红了！”

萧军感觉不对,猛地站起来,厉声说“:你们要干什么?”

那人指着手上的条子说：“蒋锡金请你们去吃饭，他在馆子里等你们。”

这时端木看到窗外也有人，心想，不好！是特务来抓人了。正捉摸怎么来对付的时候，萧军却和那两个人打起来了。

萧红叫着“:别打!别打!”

两个女学生也吓哭了。

端木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怎么随便闯入民宅？

这时又进来了警察，拉开了萧军和那两个便衣，冷冷地说：

“对不起，请你们三位和我们走一趟！”

萧军气冲冲地质问“:凭什么?”

警察指着名单说“:就凭这个,我们是奉上级指示来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端木他们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萧军气呼呼地说“:走就走,还没王法了呢!”

他们三人便在警察押送下出门上了警车。端木临出门时，顺手在床上拿了一床毯子，书架上抽了一本书。

到了警察局，已是傍晚，他们三人被送到一间屋子里，有椅子和办公桌，随即警察就出去把门锁上了。

萧红不解地说：“这是把我们抓起来了？”

端木说：“拿着名单来抓我们三个，都是东北人，一定是我们的文章刺痛这帮投降派了！”

萧军气愤地大声说：“刮民党就有整老百姓的本事，得设法要外面知道才行。”

萧红说：“院里那么多人看着我们上的警车，还会不知道呀？你就别嚷嚷了！”

他们在警察局一直等到天黑，也没进来一个人，也没人送饭来给他们吃。萧红困了，他们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把毯子铺上，让她躺下了。萧军脱了上衣给她盖着，端木脱下茄克叠起来给她枕着头。萧军趴在桌子上，端木靠在椅子上，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

快天亮时，端木不知不觉睡着了，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盖到他身上，睁眼一看，原来萧红正把他的茄克盖在他身上，见他醒了，便低声说：“你有风湿病，可不能冻着。”

端木一下站起来说：“天都亮了！”

萧军也醒了过来，站直身子伸懒腰活动筋骨，并来回走动，气呼呼地念叨着：“真他妈的，不知搞什么玩意儿！”

不一会儿，听到开门声，进来一个警察，阴阳怪气地说：“你们走吧！”

端木他们三人都糊涂了，互相看看，不知走哪儿去。

警察说：“走吧！回你们家去！”

“回家去？”萧军大声说：“回家去？你们糊里糊涂地把我们抓来，又糊里糊涂要我们回去？没那么便宜！”说罢，一屁股就坐下了。

警察说：“我们是奉上级指示行事，你们不回去，就在这儿等着好了。”

萧红过去拉萧军说：“走吧！咱们回家去吧，我都饿了。”

端木也说：“先回去再说吧！”

萧军只得起来，三人便走出了警察局。

原来头天下午他们三人被捕后，艾青像往常一样来到小金龙巷，还没进门，便看到有人正在散去，他觉得气氛不对，便问出什么事了？老乡说警察局来抓人了。艾青当时便没有进去，后来才知道端木萧军萧红被捕了。这消息很快在文化人中间传开。胡风是湖北人，有一些上层关系，连夜托人营救。当时国民党当局是怕三位东北作家在“一二 • 九”前后再写什么文章，掀起学生爱国热情上街游行，所以就以“抓人”的方式来镇压一下，后来有人出来说话，因此连问都没问，就把他们三人放了。

萧军回到小金龙巷，就说要登报控诉国民党迫害文化人，萧红胡风等都不同意，就放下了。

没过多久，萧军萧红为了办刊物方便，便搬走了。临走的时候，萧红笑着对端木说：

“我们走了，没人给你作饭吃了，看你怎么办？”

端木笑着说：“我有煤气炉，下面条吃还是可以的，饿不死。”

萧红还想说什么，萧军在外面喊她，她笑着打了端木一下就跑出去了。

虽然萧军萧红搬走了，但小金龙巷仍是他们的集会地，经常来这里聚会、讨论、争论问题。

萧军萧红搬走后，端木就住到他们屋里来了。一张大床上，一大半都是书和稿子、报纸、刊物，只留下睡一个人的地方。屋里放着煤油炉、火柴、挂面、未洗的碗筷。端木爱写毛笔字，桌上放着墨盒、墨汁和毛笔，窗台上放着毛边纸……总之，是一个“乱”字。

刘国英和她的同学没课的时候，常来看端木，不是帮他收拾这，就是帮他收拾那，除了那一摊子书和稿子，都可以动。

萧军和萧红虽然搬走了，但也常来，有时是两人一起来，有时是萧红独自来。一次，萧红来看端木，来了就笑端木的脏乱差，边说边顺手帮他理一理。萧红见到毛笔、墨盒和纸，高兴地铺在桌子上又写又画起来。端木这才知道萧红也是学过画的。因为端木小时也学过画，很自然地谈到一些对画的看法。谈得晚了，

萧红要端木出去吃饭，端木正赶写一篇稿子，便说在家吃，要萧红尝一尝他下面条的手艺。

萧红兴致很高地说：“今晚月亮那么好，还是出去吃吧，我请客。”

端木看了看窗外，月色确实不错，便和萧红一起出来了。挑了一处江边的小馆子，坐在靠窗边的桌子，要了两个菜和些零吃，边吃边聊，从手头的创作谈到各自的理想。萧红只想能有个安静的环境写东西。当个好作家，这是她最大的愿望。端木仍想当战地记者，只要有机会，他就走这条路。萧红听了直摇头，说他那样的身体根本不是那块料……这顿饭吃了足足有两个小时。回来路过一座小桥，萧红拉着端木在桥上看了会儿月亮。

萧红依着栏杆，轻声念道：

“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水……”诗明明没完，但却不念下去了。端木觉得萧红有些兴奋，便说：“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萧红说“：好吧！”便挽着端木的胳膊往回走了，走到小金龙巷口，萧红说声“再见！”便转身回去了。

有一次，端木出去办事回来，看到桌上铺着纸，在一些行书草书中间，很明显地题了几句诗：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最后一句重复练习了好几行。

端木知道萧红又来练过字了。不过她引用张藉的

诗，没引全。

有时萧军过来也到屋里来，提起毛笔在毛边纸、报纸上挥挥洒洒地练字写诗。有一次边题、边念出声来：

“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

还写了“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八个大字。

萧红见了，笑道“你写的啥呀？你的字太不美了，没一点文人气！”

萧军瞪了她一眼：“我并不觉得文人气有什么好！”

由于外屋胡风他们在讨论问题，把他们三人叫出去了，也就没有争论下去。但萧红走到外屋，偏偏挤在端木旁边坐下，端木不得不往那边挪一挪。萧军却靠在门口，歪着脑袋看着他们。

端木那时一心扑在创作上，只想写出好作品来，对这些迹象就没往心里去。

1938 年元旦期间，胡风、聂绀弩、艾青、萧军、萧红、邱东平、田间、冯乃超、楼适夷、王叔用等人都到小金龙巷聚会，端木撂下笔也出来参加。大家就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和展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风即时作了纪录。最后告诉大家：

“这个座谈会纪要，要发表在《七月》 1938 年第一期上。”

萧红马上笑着嚷嚷道“: 老胡真会抓稿子,这么多人发言，稿费怎么给呀？”

不知谁喊了一句：“吃一顿嘛！”

大家都笑了。

1938 年 1 月,臧云远从山西来到武汉,为当时阎锡山创业的民族革命大学招兵买马，阎锡山自认校长，李公朴当副校长。

臧云远 1932 年在北京和端木都是“左联”成员，在红楼同住过一间房，感情很好。抗战开始后，臧云远受民族革命大学之托，到武汉来找端木，要端木介绍一些当时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端木当即告诉常来小金龙巷的萧军、萧红、聂绀弩、艾青、田间等,除了蒋锡金要编他的刊物,胡风要留守编《七月》之外，其他人都愿去临汾就教。

下旬，这批文化人和召来的许多学生，便乘铁皮车驶向山西了。当时臧云远要端木他们不要和学生一起乘铁皮车走，过几天就可以乘客车走。但当时端木抗日热情高涨，愿意和小学生们挤在铁皮车里一起走。当列车进入山西境内时，他们又都换上了阎锡山在山西修建的小火车。一路上说说笑笑，有时争论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但为了抗日的共同目标，毫不介意。

萧红总喜欢挨着端木坐，端木也像对待姐姐似的

对待她。在争论问题的时候，他和萧红的观点常常是一致的。路过黄河的时候，一望无际的黄沙，使车上的这些青年作家都寂然无声了。

端木不由地说了一句"：北方是悲哀的。"

艾青听了，由这句话写了一首诗，取名《北方》，开头写了一句引言"：科尔沁旗草原的诗人说，北方是悲哀的。"

2 月初，他们到达临汾。

民族革命大学，没有具体的校舍，整个临汾就是一所大学校。从武汉来的这些作家和四面八方来的学生，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每天清晨可以听到军号声，一队队的战士跑步操练，《救国军歌》此起彼伏，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端木被臧云远安置在老乡的一间屋子里，屋内有炕，为了方便写东西，端木一人独住，经常有学生来找他，和他谈创作，谈时局。

萧军、萧红、聂绀弩、艾青、田间，还有李清泉等，也被安置分住在老乡家里。

当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亦从潼关到达临汾，和这批青年作家汇合，相聚甚欢，特别是萧红和丁玲两位女作家，都是彼此闻名而没见过面的，更是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时局很快发生变化，临汾又面临撤退，到哪里去，又成了讨论的话题。

萧军和萧红在往哪儿去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萧军在上海时，感情上曾经有过对不起萧红的事情，因而萧红远去日本，在武汉时，萧红也曾对端木谈过，透露出对萧军这次感情的不忠耿耿于怀。更主要的是忍受不了萧军那种大男子汉的气息。所以在几个月的接触中，萧红对别人都能心平气和，非常友善，甚至是以相投的态度来交谈、对待。唯独对萧军，总是一触即发的争论、打击、甚至讽刺，一直要争论到她胜利为止。不过，两口子之间争吵得多么激烈，也是两口子之间的事。这一点端木很明白，从未表示过谁是谁非。在武汉时还写过一首赠萧军的诗。

就在撤退临汾的前夕，萧红突然要端木和萧军一起走。因为萧军要去打游击，她说萧军太鲁莽，她不放心。端木还来不及表态，萧军就大声说：

“我谁也不用陪,我身体这么棒,到哪儿也不怕!”

萧红气愤地说：“这么说，你决定一意孤行了？”

萧军也气愤地说“你管不着!”说罢掉头就走开了，把萧红“晾”在那里。

聂绀弩走过来挽着萧红说：“萧军就是炮筒子脾气!”

萧红一声不吭地随着聂绀弩走开了。

紧接着，他们随民族革命大学撤离临汾到运城去。萧军决定留下准备打游击。到车站来送行。

萧红没有表情地坐在车箱里，一声也不吭。车开时，端木、聂绀弩等都挥手向萧军告别，萧红始终坐在那里没动。

在运城没多久，端木、萧红、聂绀弩、田间等就准备随丁玲的战地服务团到西安，因为那样可以有机会到延安去。

在火车上，丁玲要塞克和端木、萧红、聂绀弩合作，写一个话剧剧本，结合当时形势宣传抗日，以便到西安上演。因此，他们一路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结构故事、缕出人物、分出场次，边说边由战地服务团团员李金才记录。

李金才是燕京大学学生，为了抗日，才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到西安后，由塞克整理出剧本，取名《突击》，交由战地服务团日夜排练，因为结合了形势，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场场爆满，还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在西安，他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大院。端木、萧红、田间、聂绀弩等分住在高台阶上一排屋子里。

一天下午，塞克兴冲冲地抱来几根树枝，告诉端木，这种木头作手杖最好，有弹力，不易折断，并掏出小刀，边说边刮。端木也挺有兴趣，在院外石堆中找到一块玻璃碎片，也来刮木棍。

塞克对端木说："你穿马裤马靴，拿一根马鞭，再合适也没有了。"

二人正干得欢，萧红在屋里听到外边的欢笑，放

下笔也走了出来，看见他们在削木棍，过来拿起树枝看了一下，笑着说：

“这树枝再好，也没我的好！”说罢，转身入内，不一会儿，拿出一根竹子作的小棍来。这小棍二尺来长，上面有许多节，光滑嫩黄，确实很精致。

萧红用小棍轻轻敲了一下端木问：“怎么样？”

端木接过小棍，轻轻闪了两下说：“确实不错，这是南方才有的竹子，北方哪有这样精致的东西？”

萧红高兴地说：“对喽！就是从南方带来的，我一直放在箱子里，从没拿出来过。”

聂绀弩、田间听到外面说话，也出来了，看到小棍，也不免讨论了一番。塞克和端木尽管做两根小棍，而比起萧红那根小棍还是逊色多了。但毕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也还是挺喜欢的。

傍晚，他们各自拿着小棍散步的时候，端木有些恶作剧，拿着自己的小木棍，乘萧红不备，轻轻地敲打了一下她拿着的小竹棍，小竹棍应声就掉在地上了。

端木笑着说：“你那漂亮的小棍，还是没有我们的结实吧？”

萧红捡起小竹棍笑着说：“我就不信，我这棍儿没你的结实！”边说边拿着竹棍向端木手中的棍儿打将起来。

旁边的塞克、田间、聂绀弩等都笑着看他俩的

“棍仗”。没想到端木手中的棍儿，被萧红的竹棍狠狠一击，断裂了。

萧红得意地大笑：“怎么样？还是我的结实吧？”

端木也笑着说“:好,我辛辛苦苦削成的棍儿被你打断了，你得赔我！”

萧红说：“你不是说你的棍儿结实吗？”

端木说“:这么着吧,把你那根小棍送我吧,就不要你赔了!”

萧红还没回答，聂绀弩在旁冷冷地说：

“萧红这根小竹棍儿，我早就向她要了。”

萧红听了不觉一愣,但马上说“:这么着吧,我把这小棍儿藏起来，明儿早上你们到我屋里来找，谁找到就送给谁。”大家说好,一边笑着,一边向宿舍走去。

第二天一早,萧红到端木屋里悄悄对端木说“:我的小棍在门背后，就看你找不找得到了。”说完就笑着走出去了。

吃罢早饭，聂绀弩叫着端木，一起到萧红屋里找棍儿。

聂绀弩直奔萧红的皮箱，端木却用眼睛扫了一下门后，见墙犄角除了扫把外，什么也没有。心想没准萧红在“涮”他。但看到门后钉子上挂着萧红的外衣时，便沉住气了。

这时，聂绀弩翻完了萧红的箱子，又准备翻萧红的床。

萧红笑着说“:别乱翻,不在床上。”

而这时，端木却伸手在萧红外衣下面摸到了那根小棍儿,高兴地叫着说“:小棍儿在这儿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以后，端木穿着茄克马裤马靴，头上戴着船形小帽，这小竹棍儿的马鞭，就几乎从未离过手。有的人看着他这付装扮，觉得没什么，可有的人看了就觉得很不舒服。加上他不爱理发，又很少主动找人交谈，一味沉浸在他创作的天地里。

在上演话剧《突击》时,端木、萧红、聂绀弩、田间等，也在台下看戏，正看得入神，一位战地服务团的人来把萧红叫走了。直到戏快结束时，萧红才从后台走出来。在回宿舍的路上，萧红告诉端木说，丁玲出了点问题，很快要回延安去，整个服务团还留在这儿。

端木听了高兴地说：“那我们可以和丁玲一起去延安了?”

萧红却半天没有回话，到了驻地，才低低地说了一句“:听说萧军已经到延安了。”没等端木回话,就到自己屋里去了。

在西安这段时间，萧红似乎比以前快活，显得自由自在。和别人交谈，虽然有时争论得也很激烈，但没有堵气、逞强的味道。和端木接近得更多了。常常

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想写的题材，以及对写作的看法。也谈她的身世，她的祖父、她的有二伯……

端木觉得萧红想象力非常丰富，不论看到什么，都会引发她一些联想。有一天晚上，他们几个人从外面回来，不知是谁拿着手电筒在前面边走边照路，萧红看到手电筒射出圆圆的光，便对端木说：

“你看，那手电筒射出的光，像不像海蜇在海里浮游？”

端木看了说“：像！”但心里却想刚才谈论的根本与这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事，她的思想怎么一下就转到海蜇上去了？从而觉得她的联想力特别丰富。端木认为，只有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来。

丁玲有事要回延安，聂绀弩约萧红、端木和他一起随丁玲去延安。但萧红因为知道萧军已经去了延安而坚决不去，并且要端木也别去。本来极想去延安的端木，也就没去。

西安名胜古迹很多，端木最爱去的地方是“碑林”。尤其爱在《三藏圣教序碑》前观赏琢磨。因为端木知道这是唐代和尚怀仁从王羲之遗墨中选集的字书写而成的；内容是唐太宗为唐僧玄奘法师译佛经所作的序文，和太子李治作的记；以及玄奘写的谢表及心经，所以统称《三藏圣教序碑》。

端木从小就喜欢王羲之的书法，这回到了西安，便要欣赏个够了。萧红知道了，也要和端木一起去欣

赏，并要端木讲解。因为萧红也爱书法。端木讲起这些问题，也和他写东西一样不落俗套，深入浅出，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时时夹杂一些诙谐的语言，使萧红很爱听。两人常常乐而忘返。误了吃饭时间，就在街上吃小吃。萧红特别爱吃西安街头的粉皮儿，而且爱放很多醋。端木发现她特别爱吃酸的，还开她玩笑。和他俩常在一起的，还有塞克、王力等。他们都喜欢在一起聊天，无拘无束地谈论问题。

不久，丁玲、聂绀弩从延安回来，没想到萧军也一起来了，这是萧红没有料到的。大家一阵欢迎之后，端木回到自己屋里，准备写他正在写的文章。

萧红走了进来，端木转过身看见她一付情绪低落的样子，便问：

“你不舒服么？”

萧红还没有回话，萧军就大踏步地走了进来，完全一付“家长”的气派，粗声粗气地对萧红和端木说：

“萧红，你和端木结婚吧，我和××结婚！”当时端木屋里还有一架破钢琴，萧军说完还用手在琴键上打了一下，发出“当”的声音。

这一阵旋风，把端木和萧红都刮愣了，待缓过气来，萧红生气地说：

“你这是什么话！你和谁结婚我管不着，我和谁结婚难道要你来下命令吗？”

端木也生气地说：“你也太狂妄了！你把我们当成

什么人了？”

萧军怒冲冲地说：“我成全你们不好吗？”对着端木说：“瞧瞧你那德性！”

端木也怒冲冲地站起来说：“你想干什么？你怎么随便侮辱人！”

萧军说：“我就是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小子！”

萧红看萧军那架式是准备打架，急忙插了过去，推着萧军说：“走！走！咱们有话到外边说去！”连推带拽的就把萧军拽出去了。

端木极不平静，没想到突然来了这一阵风暴。他想到和萧红这些时的交往，可以说是志同道合，都欣赏彼此的才华，很谈得来。萧红虽是有夫之妇，萧军虽有过对不起萧红的地方，脾气粗暴，使萧红有时感到很痛苦，尽管萧红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说起过，但他俩必竟是患难与共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两口子吵架是常事。他从来都是把萧红当姐姐样地对待。萧红对他好，关心他的生活，他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端木从小就在女性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长的。但现在萧军突然说出了要他和萧红结婚的话，这说明他和萧红要彻底分开了。他们真要彻底分开，他自己能和萧红结婚吗？……

那时，端木还从未考虑过要结婚的事，虽然他母亲一直在关心他的终身大事，有时他为了使母亲放心，也想为母亲找一个妻子，安慰她老人家。但现在

是战争时期，却是从未考虑过要结婚的事。现在，目前的现实，却迫使他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他知道萧红一直都很关心他，彼此也确实相投，但还没有达到恋爱的程度。自己是退出来，还是听其自然？……真是辗转不能成眠了……

这时听到萧红屋里萧军和她争吵的声音，时而大，时而小。他们之间的火山爆发了。

第二天，端木看到萧红的眼睛是明显哭过的，而萧军仍然是一付毫不在呼的架式。

这一天，萧红没有到端木屋里来找他，见到他也没象往常一样地有说有笑地打招呼。在这种情况下，端木也没和她打招呼，吃了饭就回自己屋了。但思想里是极不平静的，坐在桌旁，对着铺开的稿纸，一个字也写不下去。……

四、定情

这时，萧红悄悄地进来了，站在端木背后，轻轻地说：“端木，我们出去走走吧！”

端木站起来说“好！”顺手戴上他那小船帽，拿了围脖，就和萧红一起出来，慢步向公园的路上走去。

足足有半个小时，谁也没说一句话。往常萧红总是主动挎着端木的胳膊，今天却没有挎他，只是两人并排默默地走着、走着、走着……

到了公园门口，端木犹豫了一下，意思是征询萧红是到公园去，还是不到公园去？

萧红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进了公园了。端木当然立即紧跟在后面。

萧红走到公园树丛密集的地方，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拦着他，两眼直直地看着端木说“我和萧军彻底分开了。我将他给我的信全部还给他了。我向他索取我的信，他却不给。他力气大，我也抢不过他，只有随他去。”

端木沉默了一下，慢慢地说：“这么说，你自由了！”

端木说完这话，以为接着而来的是萧红爽朗的笑

声。殊不知接着而来的却是萧红掩面痛哭。

这下可把端木哭慌了，从来没有主动碰过萧红的端木，急忙过去扶着她的肩膀问：

“怎么了？怎么了？”

萧红一语不发，索性扑在端木怀里更加伤心地哭了起来。

端木生平还没有碰过女人哭倒在他怀中的事，更是慌乱不堪地拍着萧红的肩膀，连连地说：“别哭，别哭！怎么了？怎么了？”

萧红哭了一阵，猛然抬起头，坚决地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端木问：“什么事？”

萧红退出端木的怀抱，往后站了两步，睁着一双大眼睛定定地看着端木说：“我和萧军有孩子了。”

端木一时转不过弯来：“有孩子？”

萧红死死盯着端木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已经怀了四个月的身孕。”

端木直觉地问：“萧军知道吗？”

萧红：“当然知道！”

端木惊诧道：“那他还要你和我结婚？”

萧红仍毫无表情地死死盯住端木地眼睛说：“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人。”

端木不自觉地喊了一声：“天哪！”便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将萧红紧紧搂在怀里，气得全身发颤地说：

“你，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啊……”

萧红依在端木怀里，更加痛哭起来。

萧红起先一直担心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端木，端木会拒绝她，没想到端木不但没拒绝她，反而同情她，紧紧拥抱了她……

端木第一次尝到了亲吻的滋味……

他俩手挽手地轻松愉快地回到驻地。

萧军和萧红分开的消息，驻地的同志们、朋友们都知道了。萧红和端木也就坦然地在一起了。

萧军似乎还不甘心，常常手头拿一根大木头棒，走在萧红和端木的后面。有一天晚上，萧军突然踢开端木的房门，探头往里面看了看，气凶凶地说：

“走 端木,我们去决斗！”

端木看着这位心甘情愿地把怀孕的妻子双手送给别人的汉子，又来找人决斗，简直理解不了。只得站起来说：

“到哪儿去决斗？”

萧军“:到城外去！”

端木“:证人呢？”

萧军大声说：“用不着！就我们两个！”

他的声音被住在那边屋的萧红听到了，便急忙走了过来，厉声说：

“萧军!你耍什么野蛮?这里是八路军办事处,不是其他地方，你这种宪兵作风还是收起来吧！我告诉

你，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把他弄死，我也把你弄死！我是说话算话的！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没想到萧军看了萧红这付架式，“哼”了一声，倒转身走出去了。

萧红恨恨地说：“这种人就得这么对付他！”

接着，萧红和端木商量定；萧军要去延安，他俩就回武汉，萧军要去武汉，他俩就去延安。后来萧军决定随丁玲去延安，端木和萧红就回武汉了。

五、结婚

在火车上，萧红紧偎着端木喃喃地说：

“到武汉,第一件事就是在报上登启事。”

端木问“:什么启事?”

萧红“:和萧军分开的启事。”

端木说“:有这个必要吗?你和萧军也没有正式结婚,从法律上说也不需要。再说,现在是抗战时期,你又不是无名之辈，何必为这事闹得满城风雨呢。”

萧红觉得端木说得也对，便挤了挤端木说：“好,就听你的。不过萧军的孩子我决不要，到武汉我就找人把它打了。”

端木知道这是萧红心上的病。但自己对这类事可是一窍不通了，因此不知说什么好而没有吭气了。

萧红抬头看他：“你怎么不说话?”

端木苦笑地说“:对这,我一点也不懂,到了武汉再说吧。”

在西安，萧红就接到池田幸子从武汉来的信，要她到武汉去,说她在武汉等她。因此,车到武汉后,端木先将萧红送到池田幸子那儿暂住，自己就到武汉大学去找刘国英，以便向她父亲借些钱来。

刘国英见到端木，非常高兴，告诉他三哥马上就要来武汉和她定婚，日子都定了，端木能来参加太好了。端木当然也很高兴。

刘国英要端木住她父亲那儿，有的是房间。可端木想到萧红也住刘老太爷家不合适，便说先借点钱，然后再到小金龙巷看看房子空不空。他通过刘国英，拿到 20 元大洋，便去找萧红，一起到小金龙巷。

蒋锡金热情地接待了他俩，告诉他们原先的房子还空着，只是欠了几个月的房租，将房租补交后即可住进去。

端木一口应承下来，他想到和萧红结婚的房子也有着落了，便放心了。

萧红迫不及待地要蒋锡金帮她找医生打胎，当蒋锡金知道萧红已和萧军分开，怀的是萧军的孩子，目前又与端木热恋后，还是准备为她找医生的，但终因胎儿已大，堕胎有生命危险而作罢。

端木三哥 4、5 月间从浙江上虞匆匆赶来武汉和刘国英定婚，刘国英是独生女，其父当时是交通部邮政总务司司长，地位和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结交的都是当时高级人士。因此，定婚酒筵场面大而热闹，在报上还登了大大的订婚启事。

端木和萧红当然是要参加的，但萧红和池田幸子事先约好参加一个活动，在江那边一时赶不过来，因此只有端木独自参加了。

端木三哥只请了十天订婚假，仪式举行没两天就要回浙江上虞去了。在忙定婚之余，知道端木要和萧红结婚，起先是反对的，觉得萧红年龄比弟弟大，又结过婚，母亲是一定不会同意的。要端木多考虑考虑，不要忙着结婚。

但端木对三哥说这是他自己的事，不告诉妈妈就行了。并且决定近期就结婚。三哥是知道老弟的脾气的，觉得他们已到了这种程度劝也不起作用了，就只有随他了。临行前，给老弟留了一笔钱，安排结婚用。因此端木和萧红决定五月在汉口大同酒家结婚时，三哥已经走了。倒是刘国英以未过门嫂嫂的身份，帮了他们不少忙。

池田幸子送了一块很贵重的旗袍料给萧红结婚作礼物,并且告诉萧红说,这是一位大官送给她的,她穿不着，就送萧红了。

刘国英看了说好，萧红因为知道这料子的来历，不愿穿，就借口太厚，买了一块红纱底金绒花的旗袍料，刘国英和同学窦桂英帮她作了一件旗袍，配什么颜色的纺绸作衬裙时，刘国英说白纺绸鲜亮，花朵都能显现出来。而萧红却要买黑色纺绸作衬裙，她说显得庄重。刘国英觉得还是白色的好，但她知道萧红是名作家，还会画画，自己懂什么。所以还是帮她作了黑纺绸衬裙，在开叉的边上还襄了花边。试旗袍的时候，把腰那儿还拆开放了一下，刘国英觉得萧红整个

身材都好，就是腰略为显得粗了一些。当然不知道萧红那时已有五个月的身孕。

端木理了发，作了一套浅驼色西服，打着红领带。两人出现在汉口大同酒家婚宴上时，大家都觉得是多么漂亮而文雅的一对。

端木和萧红 1938 年 5 月下旬，在汉口大同酒家结婚。主婚人请了端木三哥未婚妻的父亲刘镇毓（号秀湖），还请了胡风、艾青等文化人氏，再就是刘国英和她的武汉大学同学。

刘老先生首先举杯，以主婚人的身份致祝词，并感谢大家的光临，众人也频频举杯祝新人幸福，白头偕老！刘国英坐在胡风旁边，胡风还时不时和她们开玩笑，为她夹菜。

当时，端木和萧红并不想为婚礼来个大大的操办，只是想在亲友面前表明一下他俩的关系。端木从来的观点是，两人既要在一起共同生活，那就首先应该结婚，明确关系。这一点，萧红也是同意的。

当晚，送走主婚人及客人后，两人回到二楼包的头等房间，一张锃亮的大铜床，紫檀木的梳妆台，在红宫灯下也熠熠生辉。他俩从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看到对方，都是闪亮的眼睛，白里透红的脸庞……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当他俩洗了澡，换上睡衣，躺在床上，熄了灯以后，端木可有点犯愁了：他活到 27 个年头，也写过小

说，但真正接触女人，还从来没有过。同时，他想到，女人在怀孕的时候，是不能发生性关系的。皇帝有那么多妃子，据说也有这个原因。小时，母亲怀小妹妹了，父亲就不来和母亲睡觉了，说这是“胎教”。他一边抚摸着怀里的萧红，一边喃喃地告诉她这些想法，问她知不知道这些“古训”？

没想到萧红听他说完，更加紧紧地搂着他、亲他，庆幸地说：

“我可遇到一个懂礼的人了，我的亲人！我的兄弟！……”说着说着，不由地又哭了起来。

端木惶恐了，忙搂紧说：

“说得好好的，高高兴兴的，怎么又哭了呢？亲爱的！”

萧红抽咽着说：“我想起在哈尔滨快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端木用嘴堵着她的嘴说：“别想了，别想了，过去的事想它干什么？挑愉快的想，想我们今后怎么好好生活，好好写东西！”

六、武汉

第二天，他们搬回了小金龙巷。

萧红很会布置小家，不但桌上铺了桌布，还买了价廉物美的花瓶，插上几支康乃馨，娇艳得和她自己一样。萧红在桌子两边安排了她和端木创作的地盘，不但可以随时探讨写作内容，还可以互相对看……

他俩在小金龙巷过了一段幸福而平静的生活，朋友来得也不多。端木不要萧红在家作饭。多半是到附近的小馆子里去吃萧红想吃的东西。除非萧红兴致来了，想作她的拿手菜，这才在家自己作。萧红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了，人也显得丰润起来。

自从结婚后，端木就将自己的钱都交给萧红管了。独自出去办事时，就向萧红要。因为端木最不会、也最不爱管钱，常常不记得钱放在哪儿了？但常常又会在哪件衣服或裤子兜里发现了钱。这时，就象是发了意外之财地高兴，还嚷嚷着要“请客”。

萧红笑他“：明明是自己的钱，还当作发意外之财挺得意呢。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没想咱们家也出现了！”

端木冲着萧红就要打她，萧红笑着转身就跑，端

木想到萧红是怀孕之人，立刻站住说：“别跑，别跑！这回饶了你！”……

武汉天气突然闷热起来，因为听刘国英来说过，东湖游泳池已经开门了，萧红热得难受，就说去东湖游泳。端木怕萧红累着，还叫了出租车，那时的出租车是方方的，开起来轰隆轰隆地响。他们先到武汉大学女生宿舍，叫了刘国英和她的同学窦桂英，一起再去东湖游泳池。虽然武大女生宿舍就在东湖边上，但要绕到游泳池这边，还要经过男生宿舍，足足有一站地。

到了游泳池，他们买了门票，分别进更衣室换游泳衣。

端木匆匆忙忙换了游泳裤出来等她们，见她们出来，连忙过去扶萧红，下台阶的时候说：

“小心点儿,别滑着！”

刘国英笑着对窦桂英说“:瞧,曹京平那副献殷勤的样儿！”

窦桂英也笑了。

萧红回头问她俩“:笑什么呢？”

刘国英调皮地说“:不告诉你们。”和窦桂英更加笑了起来。

萧红也笑着说：“这两个姑娘！”

他们在水中玩了一个多小时，端木怕萧红在水中泡久了不好，便催着她们上岸回去。三位女士换好衣

服，一边擦干头发，一边坐在外面等端木。可是等了半天，都不见端木出来。

刘国英说：“会不会等我们半天，没见我们出来，先走了？”

萧红说：“不会，再说我们出来也够快的。”

刘国英说“:我去看看”边说边向男更衣室那边走去，在门口向里张望了一下，也没看见，又冲里喊了两声：“京平，京平！”也不见答应，便对萧红说：

“我看没准真走了，我们往大门那边走过去看看吧。”

萧红不信端木真走了,便对刘国英说“:你俩个到前面看看去，我在这儿等他。”待刘国英她俩个走远了，萧红就走到男更衣室门口，斜着往里看，刚好看见端木低着头在找什么。

萧红忙喊他“:端木,怎么了?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端木跛着一只脚到门口说：“我一只鞋找不着了。”

萧红笑着说“:你放哪儿了?”

端木：“我明明放在衣服底下的，可把衣服穿好后，就是找不到那双鞋了。”

这时,刘国英窦桂英又走回来,对萧红说“:没看见他!”

萧红笑着对她俩说“:你们先回去吧,他一只鞋找

不着了，在里面找鞋呢。”

刘国英更笑了，揭老底说：“还是和在天津上中学时一样，丢三拉四的。有一次洗了澡，找不到衣服放哪儿啦，还是三哥脱了外衣把他裹着出来的！”大家听了都笑了。

端木踏了一只鞋，一拐一拐地走出来，也笑着说：“走吧，走吧！不找了！出去到附近鞋店先买一双鞋去。”

三位女士也无法进男更衣室去帮他找鞋，只有一路笑着走出来。刘国英窦桂英他们回学校去了。萧红扶着端木不但到鞋铺买了一双皮鞋，还买了一双袜子，换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还在馆子里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饭，丢了鞋似乎还要庆祝一下，高高兴兴回家了。

一天上午，端木醒来，看见萧红披着睡衣，依在窗前看稿子，晨光衬着她丰满的体形，不由想起荷兰名画家维米尔的名画‘看信的女人’。端木看痴了，都不想起来了。

萧红也许感觉到了，回头看见端木正痴痴地看着她，不由地脸上飞起了红云，娇嗔地：

“看什么呢？我的小懒虫，还不快起来？”

端木耍赖地：“那你来拉我呀！”

当时，端木和萧红的稿费和版税，完全可以维持

生活，但是，战事日紧，武汉不断遭到轰炸。外地来武汉的文化人，纷纷往重庆撤。那时，罗烽、白朗和他们的母亲在武汉，要买船票去重庆。萧红要端木找罗烽，托罗烽在买船票的时候，也帮他们买两张，准备和他们一起走。可罗烽第一次只买到两张船票，他要给端木和萧红先走，但他俩觉得托人买票已经够交情了，何况他们还有老人呢，因此就要白朗和老太太先走了。没几天，罗烽又买到两张船票，到小金龙巷来告诉端木，是不是他和萧红先走，他一个人好办。但萧红却说白朗和老太太已经到重庆了，正等着他去照顾呢，怎能让他留下来呢？

端木说是，便要萧红和罗烽先走。

萧红对端木说：“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端木笑了：“你不放心啥？难道会有狼来把我吃了？”

刚好那天安娥来看萧红，也笑着开玩笑说：“倒不是怕狼来吃你，而是怕人来把你吃了！”

萧红笑着伸手打了安娥一巴掌：“瞧你说的，我是说像端木这样的人，我要先走了，他还能买到船票呀？没准把自己还丢了呢！”又转过身来对端木说：“你还是先和罗烽一起走吧！”

端木严肃地说“:那怎么行?你一人留下来,我能放心吗?要不你先走,要不我俩一起留下来。”

萧红又急又气地大声说“:好不容易有张票,你还不赶快走,我一个女的,又是大肚子,肯定会有人来照顾的,你留下来,紧张了,谁来照顾你?我能放心吗?”

安娥在旁也说“:我看萧红说得对,你就和罗烽先走吧,我们女同胞肯定会有人照顾的。”

罗烽也说“:端木就和我一起走吧,你先到重庆打个前站,以便萧红去了就有个落脚的地方。听说现在重庆已经人满为患,旅馆爆满,物价飞涨,根本找不到住处了。”

萧红果断地从桌上拿起一张船票说:“别犹豫了,罗烽,这张票你拿去,明天下午我送他上船。”

端木知道,不管大小事,只要萧红执意要按她的主张办,是怎么也拗不过她的。同时觉得罗烽说得也对,是得先去重庆把落脚的地方找好,萧红是有身孕的人,得事先安排她住处才行。所以就同意和罗烽先走了。

安娥临走时,还要端木放心说“:萧红就交给我们了!”

七、重庆

端木和罗烽到重庆后，罗烽将江津地址写给端木，并告诉端木如果重庆找不到落脚之地，可去江津找他，随即罗烽就去江津了。

那时，上海复旦大学已迁至重庆，教务长孙寒冰知道端木到重庆了，就找他，要他到复旦大学去教书，暂时安排端木先住在昌平街黎明书店的楼上，这里是复旦大学办的刊物《文摘》的门市部。但端木知道这里住的都是单身汉，自己一个人住是没有问题，但他得找个地方安置萧红才行。这时他想到当时二嫂胡隽吟的妹夫，范士奎的弟弟范士荣在重庆，因此在随身带的小本上查到了地址找去了。

范士荣是早到重庆的，那时房子容易找，质量也比较好。见到端木也很热情，尽管当时他家里已经住了不少人，但也还是同意萧红去了可以住在他家。端木当然很感激，这样，萧红来了至少可以有个落脚处。随即将范士荣的地址写信告诉萧红。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

以坐这车一起走。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接着肖红又来信说，安娥不来重庆了。那么萧红呢？怎么还没来？

端木正焦急时，又接到萧红的信，说冯乃超为她和他夫人李声韵买好票，一起来重庆，船名船号都写了。端木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范士荣太太为萧红腾出了一间小屋。端木按时到码头去接她。

在码头，看着船驶近，看着船靠岸，萧红呢？怎么还没出来？旅客提着大包小包熙熙攘攘都下船了，可就是没见萧红。端木急了，找到船长室去问，人家告诉他，沿途都有下船的人，是不是有事下去赶塌了班了？告诉他明天再来看看，旅客塌班的事倒常有。

端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范士荣家给萧红留的小屋里躺了一夜，第二天又按时去了码头。

谢天谢地，端木终于看到倚着船栏低头看着江水的萧红。情不自禁地喊了两声，但由于端木声音小，萧红没听见，仍然看着江水。

萧红因为赶塌了船，决没想到端木会去接她。待到船拉揽绳时，才听到端木叫她的声音，急忙抬头向岸上看，见到端木在使劲地挥手，高兴地也欢叫了起来！

萧红脸色有些苍白，肚子已经明显地看出来了。她一边将东西递给端木，一边问：

“你怎么会接到我了？”

端木调皮地说“咳就有那个神机妙算嘛！”然后一边提着箱子，一边扶着萧红上岸，叫了两乘“滑竿”，便到了范士荣家。

范太太热情地迎了出来说：“曹太太一路上辛苦了，今天要再接不到，可要把曹先生急坏了。”

萧红第一次听到人家叫她曹太太，不禁愣了一下，随即就高兴地笑了，和范太太寒喧了几句，就进了为她准备的小屋。

端木正在安置她随身带来的东西。

萧红进屋，一把搂着端木的脖子：“想我吗？”

端木：“不想你，会到码头去接你？”

萧红放开端木,高兴而又有些疲倦地坐下说“也亏得你还接到我了。冯太太在船上突然大吐血病倒了，看来等不到来重庆再进医院，所以在宜昌就上岸住医院了。等我回到码头，船已经开了，只有等下一班了，在码头上不小心，还让绳索拌了一跤，幸好没出事。”

端木苦笑着说“我的亲爱的,这以后你可得小心了，你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这里都是山路，可不能像以前大大咧咧了。”接着告诉她，他才到重庆，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就要他到复旦去开两节课，同时还和贾开基一起编《文摘》副刊，工作也有了，“九・一八”纪念会还请他去讲了话。目前要解决的就是得找一处比较好的房子住下才行。

萧红听了，工作有了，生活也就不愁了，倒也比较安心。

过了两天，端木通过友人在歌乐山云顶寺下面“乡建社”的楼上租了一间房，将萧红接了过去，暂时安顿下来。

这里环境不错，楼下园子里还有莲花池。萧红开始写作，端木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教书，同时编《文摘》副刊。下班回来陪萧红到山下散步。常常遇到王昆仑先生的夫人曹孟君。那时她在云顶山保育院当院长。萧红对儿童教育有兴趣，常常和曹孟君边散步边谈，还到保育院去参观过。

没有多久，端木和萧红发现住的房子里闹耗子，起先不知道，带的一些食物都让耗子拖得七零八落的。萧红特别怕耗子，一见到耗子就会惊叫起来。头一次把端木吓坏了，以为她要临产了；还有一次，耗子打架追逐，居然掉到了帐顶上。再加上端木每天上午要从歌乐山乘船到黄桷树的复旦大学，乘船人多、超载、常常有翻船事，萧红极担心。路相当远，交通又不便利，因此，端木便找孙寒冰商量，是否能为他俩找一处离复旦大学比较近的房子？

很快，孙寒冰在黄桷树山下苗圃找到两间房，端木和萧红就搬过去了。不过，这里离市区比较远，附近又没有医院，萧红眼看要临产，端木觉得要找人帮忙，作些准备才行。

萧红知道端木在生活上什么事也不懂，搬过来没几天，萧红就说自己不如到江津白朗家去生产。那里有老人帮助照应，也免得在这儿“抓瞎”。

端木觉得也对。罗烽白朗都是诚恳可靠之人，因此就写信去问了一下。没想到很快就接到白朗回信，欢迎萧红去。

这样，端木就准备送萧红去江津。但萧红坚决不要端木送，说教课、编刊物都离不开，那边有罗烽到码头上接就行了。

端木拗不过萧红，只得为萧红收拾好东西、买好船票，叫了“滑杆”送她到码头。看着船开了，端木才慢慢走了回来。想着她那么大肚子，心里总有点犯嘀咕。

没几天,接到萧红来信,说她在江津一切都好,东西比重庆便宜多了，要端木放心，并管好自己。端木这才真正放心了。当晚就给萧红回了一封信。

过了不久，端木接到罗烽来信，说萧红顺利生了一个男孩，活了没两天就死了。萧红要他写信告诉端木。

端木看信后，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为萧红想想，心里更是不能平静。立刻给萧红写了一封“慰问信”，并将自己在重庆的生活，向她详尽地作了汇报，告诉她，还在找房子，准备为她安置一个安静的家，“轻装”归来就可以投入创作了……

萧红生产后，来信说总想马上回来。但老太太坚决不让，说非得双满月才能出门。对她照顾得好极了。后来又来信说,想写东西,但常常写不下去,想他,不放心他一人在重庆。

端木回信也要萧红听老太太的话，养好身体是主要的。“坐月子”可马虎不得。萧红回信还笑端木,居然学会“老太太腔”了……

一个多月以后，端木接到萧红即将归来的信后，着实尽他最大的努力，将新搬入的房子布置了一下。买了两把竹子编的沙发椅，一个竹茶几，一个竹书架；用竹笔筒装水，插了几朵菊花……，自觉挺得意。换了一身干净西服，想到天凉了，还拿了一条围巾，就去码头接萧红了。

远远地，端木就看见萧红披了一件红格外衣扶着栏杆往岸上看。

端木连忙挥舞起围巾，终于使萧红看到了。船要靠岸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他俩目前的心情来讲，却是太慢太慢了……

萧红气色挺好，脸色白里透红。端木迫不及待地从人流中挤上扶梯，一手接过萧红手上的包，一手紧拉着萧红的手，恨不得当时就拥抱她……

端木与萧红自从在武汉结婚以来，直到萧红在江津生产以后回到重庆,他俩才开始了真正的‘密月’生活。

端木和萧红的小家，就是北碚黄桷树镇复旦大学教职员宿舍的‘秉庄’，一栋两层楼房的楼下。当孙寒冰和贾开基知道萧红已回到重庆，身体也好时，便到家来看萧红，并且邀请萧红也能在复旦大学担任一两节文学课。

没想到萧红连考虑也不考虑地一口就回绝了。使得孙寒冰和贾开基几乎下不了台。端木虽然也不会“圆场”，但他还是说和萧红再商量商量。待孙寒冰和贾开基走后，萧红说：

“我怎么能去教书 教书必得备课，还要把讲义编好。这和写小说散文不一样。讲课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学究’，要搞创作也只会写‘教授’小说了。有人写小说，就有学究味儿，我不教书，还是自由自在地搞我的创作好。”

端木知道萧红崇尚的就是自由，觉得她说得也对，就再没有提教书的事了。

萧红笑着说：“有人巴不得到大学去教书呢，我可不稀罕什么教授头衔。”

端木笑着说：“不去就不去吧，干吗把矛头对准‘在下’呢？”

萧红咯咯地笑着说：“我现在是教授家属，否则连住的地方还没有呢！”两人高兴地笑作一团。

北碚离重庆相当远，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和公共

汽车，因为逃难者猛增，到处都很拥挤，坐船几乎都超载，因此翻船就几乎成了常事了。乘汽车，又常常买不到回程票。端木因为工作需要，几天就得去一趟重庆。萧红坚决不许他坐船。有时兴致来了，也和萧红一起到重庆去逛逛，当天买不到汽车票回来，旅馆也没有空房间，就只有住澡堂子。偶尔住一两次，觉得还有点意思，但住了两次后，萧红就坚决不让端木独自在城里住澡堂子了。去重庆前，一定托人在重庆买好回程票，才允许端木去重庆。端木当然知道萧红爱护他，但有时工作逼在那里，不按时进城去办，就会使刊物脱期，有时端木急得没法，不顾萧红的阻拦就走了。回来陪了半天不是，才使萧红破涕为笑。

有一次，端木要去重庆办事，萧红也要去重庆看看山城。端木事先托印刷厂给订两张回程票，就和萧红进城了。

萧红到了城里，既不逛商店，也不逛市场，麻辣小吃也不爱，专捡小街小巷走。重庆都是山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端木腿有风湿，萧红也不是很健壮，两人常常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在重庆茶馆多，实在走累了，便到茶馆歇歇脚，喝口茶。

萧红在逛街的时候，看到卖纸钱的丧事铺里挂着剪的纸花，一串串的，拉起来挺好看，便要买了带回去。端木知道萧红不知道这是办丧事用的，便告诉她这不是装饰品，是家里死了人才买这种纸花挂呢。

萧红说“:我才不管它是作什么用的呢,我只要看着好看，我就要买。”

端木也只得由她去买。只是举着这种东西到茶馆坐下喝茶，有些招摇，引人注目，不知是什么人，认出了女作家萧红，叽叽喳喳引来了一帮女学生，端木和萧红见势不妙，连忙付了茶钱走开了。

回到家，萧红将纸花挂在窗前，还挺欣赏。好在端木也不忌讳。时间一长，纸花变了色，萧红也就把它丢了。

萧红是比较爱打扮的。怀孕的时候，就念叨着以后要作一件黑丝绒旗袍，镶上金边。生了孩子回到重庆后，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了，身材也逐渐恢复了，便兴致勃勃地要端木陪她去绸布店买几段料子。端木对此道虽然一窍不通，但为了使妻子高兴，还是陪她去了一趟绸布店，买了黑丝绒和几段衣料。萧红拿了衣料说要去找池田幸子和绿川英子为她参谋作什么样的衣服合适。

那时，池田幸子和鹿地亘绿川英子夫妇也在重庆搞日本人反战同盟活动，邀请过端木和萧红作过对敌广播讲话。塔斯社的罗果夫也和端木萧红有联系。但端木忙于写东西，编刊物，教书，萧红一头子扎进创作里，常常抽不出时间去参加这些活动。

萧红要去找池田和绿川作参谋，端木就准备送她去。但萧红不要他送，说自己知道走。到天黑了，端

木还没见萧红回来，有些不放心，便去池田幸子她们那儿接萧红，进去时，她们三位女士正谈得欢，桌上放着咖啡和零食。见端木来了，很高兴地迎接了他。绿川要为端木倒咖啡，端木是不爱喝咖啡的，谢过了她。说时间不早了，是来接萧红回去的。

没想到这一说，却引起了她们的打趣。

池田幸子说“：分开这一会儿就不行了？怪不得萧红这么漂亮呢，买这么多衣料打扮她。”

绿川英子也笑着说“：萧红好不容易出来了，我们是不会放她回去的。”

一般情况下，端木在女人面前是不怯场的。但在这两位日本反战同盟者开玩笑下，却只有傻笑的份儿了。

萧红显得很高兴，温情地看着端木说“：我今儿不回去了，你不要来接我，我们聊够了我会自己回去的。”

池田幸子笑着说：“萧红在我们这儿，你就放心吧，没人把她抢了去。”

端木无奈，只得独自回去。过了几天，萧红才回来，身上却穿着黑丝绒旗袍，镶着金边。她高兴地告诉端木，绿川、池田就不放她回来，在路上遇到胡风太太，硬接她到她家里去坐了一会，还将萧军和他老婆孩子的相片给她看。

端木问“：萧军孩子有多大？”

萧红说“没问她。”

当时，一些住“秉庄”的教授们，有的雇有保姆。有一位保姆头头样的妇女，总爱在端木他们窗台上晒鞋，端木和萧红一般都是在窗前面对面的写作，一转脸就看着这双鞋，觉着有些别扭。端木就要萧红和这位保姆说一说，以后不要把鞋晒在他们窗台上。萧红去说了，但是这位保姆在有太阳的时候，还是把鞋放在窗台照晒不误。

端木见了，发火地说“你不要再在我们窗台上晒鞋了，以后再晒，我就把你鞋子丢下去。”

这位保姆的主人是国民党，平时对端木这些左派就看不顺眼，因此，这位保姆也没把端木的警告当回事，一有太阳，鞋子又晒到了他们的窗台上了。

端木正在写东西，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实在使他忍无可忍，顺手一挥，就把这双鞋从窗台上挥下去了。

没想到这位保姆竟大声嚷了起来：“你凭什么把我洗干净的鞋丢下去？你给我捡起来！”

端木将窗子一关，气得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其他保姆对端木丢鞋子倒很赞赏，因这位保姆平时太仗势欺人了。

萧红也很生气，但听到保姆还在外面大声嚷嚷，也不得不出去解决一下。

端木到重庆不久,听了《流亡三部曲》,歌曲虽然写得很好，但是太悲伤了。因此，他写了《嘉陵江上》，由方殷拿去请贺绿汀谱曲。贺绿汀先是以进行曲的风格谱写的。端木听了，觉得思乡意境用进行曲不能充分体现出来，因而在后面必须打回去的坚强信念也就不够突出了。贺绿汀接受了端木的意见，就谱写成现在还在传唱的曲调了。《嘉陵江上》很快传唱开来。复旦学生李满红、姚奔、赵蔚青都是东北人，对失去故土都怀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们既爱唱歌，又爱写诗，更爱好文学，都知道端木和萧红，因此到“秉庄”来看他俩。李满红身材瘦小,有青年诗人之称，还会舞剑。有时特意带了剑来舞给他们看。姚奔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新诗，非常热情，自告奋勇地为端木复写文章，为萧红记录材料，他们来的时候，遇上吃饭就吃饭，遇上吃饺子，就和萧红一起包饺子。凡是这种时候，端木什么也不会作，萧红就笑他生来就有“坐享其成”的福气。李满红说能侍候两位老师，还是他们学生的福气呢。因为他会舞剑，还说将来为两位老将当“保镖”呢。

1939 年，端木和萧红都写了不少作品。10 月 19 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萧红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纪念文章。

萧红对端木说:“我不愿意写长篇大论的文章,我觉得鲁迅先生就是在日常生活上，也随时在关心青

年。我要凭着记忆，一点一滴地都写下来。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的人，会觉得鲁迅先生一定会很严厉。但见到先生后，时间越长，就越觉得先生是非常慈祥的。”

接着又告诉端木“:有一次我憋不住了,直接问鲁迅先生：您对待青年的感情，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

端木“:先生怎么说?”

萧红“:先生靠在藤椅上,吸了一口烟,沉吟了一下，慢慢地说：‘我想，我对青年的感情，是‘母性’的吧。,,

由此,端木萌发了要写《论鲁迅》。并且和萧红约好，要共同创作一部塑造鲁迅先生的文章。

萧红写完《回忆鲁迅先生》，要端木替她写《后记》。端木觉得萧红写的都是有关鲁迅先生生活的态度，因此在“后记”里为萧红作了补充说明：“鲁迅先生治学经验，接世之方法等等，以后有机会再续记。”

萧红看了不同意说“:我怎么敢这么说呢?’要端木删去。

当时许寿裳先生刚好去看端木，他看了之后对萧红说“:不要删,将来写续篇时,知道多少写多少。’这才保留下来了。

那时，戴望舒在香港，主持《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来信向端木萧红约稿,并且在信上注明,最

好是长篇小说，以便连载。

端木早就在思想里蕴酿要写中国的“带枪的人”，写新人的成长，因为抗战第一枪，就是上海闸北的一位士兵自发打响的，端木认为这士兵射出的不是一颗子弹，而是人民战斗呼声的迸然爆发。端木认为这一枪不是孤立的，它冲破了横隔的长江，和他家乡的游击队接联起来了，他想写从大江的日夜奔流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投影……。同时，也为了萧红和他的生活，所以就答应写长篇连载了。

戴望舒为了将版面搞得活跃，来信要端木亲笔提写篇名。

萧红看了信，顺手在桌上提起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了“大江”两个字。

端木在她背后看见了说：“好！就将这两个字寄去！”

萧红回头看着他“:真的？”

“当然真的,我还骗你不成？”

萧红说“:可人家是要你亲笔提名呀!”

端木爱抚地说“:傻瓜蛋,你题我题不是一样吗？”

萧红高兴地回转头来说“:我再写个试试!”

接着她又醮 墨写了几个“大江”。拿起来远看看，近看看，觉得还是没有第一次写的好。不禁喃喃地说：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了。”

端木也拿起萧红写的几个“大江”比较了一下,确

实没有第一次写的好，不由地说：“ 书法要写好，就是要有情与灵，缺一不可。 ”

萧红嫣然一笑，将第一次写的“ 大江 ”递给端木：“ 那你就将这‘ 情 ’与‘ 灵 ”的结合寄走吧！ ”

写连载是不能停笔的，稿子出笼与时光流逝是成正比的。重庆天冷又潮湿。端木讲课、编刊物，不但写小东西，还要写长篇连载，加上着凉、发烧，风湿病又犯了，以致起不了床了。萧红既埋怨他不会爱惜自己，只顾热了脱衣服、掀被子，而不知冷了加衣服、盖被子，以致于躺倒连床都起不来了。同时也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端木眼看《大江》连载续不上了，便要写信告诉戴望舒，登个启事说“ 作者生病暂停 ”。

但萧红要他不要停，由她接着写。

端木知道萧红的笔调和自己的不一样，但想到戴望舒曾来信说最好不要停，同时又是萧红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就同意了。何况报刊上“ 大江 ”两个字还是萧红代题的呢。

萧红为了写《大江》,还从头看了一遍已经发表的部分，说了自己的想法，端木认可，便写了下去，写完后念给端木听，端木说好，就发出了。直到端木能起床接着写，萧红才停笔。

香港《大公报》杨刚，也来信要端木写长篇，准备在《大公报》副刊上连载，端木也答应下来，这就

促使另一个长篇小说《新都花絮》诞生了。不过端木接受了《大江》连载的教训，没有写几页寄几页，而是写得能连载一段时间了，再将稿子寄出，戴望舒、杨刚和端木萧红还没见过面呢。

这段时间，重庆的局势也很危急，敌机随着逃难的人群轰炸，五、六月间更是变本加厉。听说北碚有个什么兵工厂还是弹药库，敌机经常来炸。端木和萧红忙于写作，对警报声常常置若罔闻，总是同事们来敲他们窗户，要他们快走，才夹着稿子走出来。有时就在山坳摆的小茶摊上边躲警报边写作；或是在山坡旁的大树下靠着，把纸放在膝盖的硬板上写作。因为敌机有时就在头上盘旋，既不投弹，也不飞走，使人烦躁不已。

端木与萧红都有些支撑不住，便想离开重庆。那时艾青已经去了桂林，端木就和萧红商量，是不是也去桂林。

萧红不赞成去桂林，说在那儿也免不了遭到敌机轰炸，不能安定写作。她说不如去香港，那里《大江》正在连载，有稿费，至少生活不成问题。

端木也觉得对，但也考虑到内地抗战正热火朝天，去香港是否合适。

萧红觉得一个作家能写出作品来，就是对抗战的贡献，其他都不是主要的。

为了听听有关同志的意见，端木和萧红决定去找《新华日报》前主编华岗同志。

华岗正在重庆乡下养病，同时编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他很高兴端木、萧红的来访。他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还是赞成他俩去香港的。他说香港的文化阵地是很需要人的，不是没事干，而是有许多事要干。不过经济方面要有保证。他告诉他们，香港的生活各方面的消费比起内地来都要高得多。

萧红告诉他，端木和她在香港报纸上都有一些文章发表，估计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华岗放心地说：“那你们就去香港。”

这样，他们决定不惊动大家，准备飞香港，端木去找孙寒冰，告诉他准备和萧红去香港的事。

孙寒冰很支持，告诉他们复旦大学在香港办有大时代书店，到香港可住在书店楼上，继续保持联系。

当时机票很紧张，端木东北老家的一位世交袁东依，在重庆工作，他有上层关系，不但能买到机票，而且可以买到当天留给有关人士的机动票。当端木去找他时，他告诉端木，明天就有一张飞香港的机票，问他要不要？

端木心想，又是一张，当然不要。端木要他近期为他们买两张飞香港的票，然后回来把情况告诉萧红了。

萧红晚上忙着收拾东西，在重庆住了一年多，家里东西还真不少。端木和萧红都不主张多带东西，只带些随身衣物和文稿行了。

端木有一只随身带的小皮箱，萧红打开为他清理东西，发现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鼓鼓的，不像是稿子，抽出来一看，还有一层皮纸包着。

萧红奇怪地问端木：“什么贵重东西？还用皮纸包着？”

端木正在写文章，回头看见了说：“这可是宝贝！”

萧红笑说：“你会有什么宝贝？最多不过是破砖烂瓦碑帖拓片呗。”边说边打开，一看是双破拖鞋，不禁苦笑道：

“端木呀端木，凡是你说宝贝的东西，都是人家不要的。”说着，就连着包装纸一起往地上丢。

端木忙起身过去捡起来：“这可不能丢！”

萧红不解：“为什么？”

端木就将抗战爆发时在上海住胡风家、胡风拿这双拖鞋给他穿，告诉他这双拖鞋是瞿秋白、鲁迅先生穿过的经过告诉萧红。

萧红两只眼睛更大了：“这双拖鞋是鲁迅先生穿过的？”

端木：“对了，这还不宝贵呀？”

萧红连忙过来，小心地打开纸包，将拖鞋放在桌子上，看了一会，禁不住“哎呀！”一声。

端木奇怪了:"怎么啦?"

萧红:"这双拖鞋我穿过。"

端木:"你穿过?"

萧红目不转睛地看着拖鞋,自言自语地说:"世上竟有这等巧事……"边说边沉浸在回忆之中，眼内不禁又涌出了泪水……

端木忙拉着她的手，温存地问："怎么回事？"

萧红喃喃地告诉端木， 1936 年在上海由于心情不好，独自在马路边散步，突然下大雨了，自己也不想躲一躲，从头到脚淋得湿透，不知不觉就走到鲁迅先生家了。许先生见了急忙拉她进屋换了衣服，鲁迅先生还要许先生拿拖鞋给她穿，当时她穿的就是这双拖鞋!"

端木禁不住"啊——!"了一声。

萧红接着说:"没想到这双拖鞋你也穿过,并且到了我们家……亲爱的，我不信神，但这却不能不说是天意。"

端木说："这不是天意，这是鲁迅先生在天之灵，要我们沿着他的足迹在文学道路上一起走下去！"

"说得真好!"萧红破涕为笑,赏了端木一个响吻。

八、香港

1940 年 1 月 18 日，端木从萧红那里拿了买飞机票和兑换港币的钱，到袁东依那里换到港币和两张飞香港的机票，除告诉了几个好友外，就和萧红于 19 日飞香港了。

他们在九龙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找到一间相当大的楼房，向南，前面直通一个大阳台，空气很好，对萧红的身体大有好处。房主人是一位能说几句普通话的年轻小姐，她的家人都到西沙群岛作买卖去了。室内家俱都是现成的。

端木和萧红刚刚安顿下来，准备出去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真是“鬼使神差”，戴望舒不知从哪里跟踪到他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首先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尽管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却像多年老友一样亲切地融和在一起了。他们一起出去吃了饭，约好次日一早，戴望舒来接端木萧红到他的住所去。并告诉他们，报上要发他们到港的消息，文协分会准备开欢迎会。香港这块文化园地，太需要外来的春雨了。

次日一早，戴望舒来接端木与萧红。他家住在薄扶林道香港大学网球场对面的山坡上，是座背山临海

的三层楼房。四周树木环绕，屋旁有小溪，远处还有一线飞瀑。戴望舒告诉他俩，他将住处取名“林泉居”。

端木微笑地说：“贺知章《题袁化别业诗》中有‘生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名字取得太贴切了。”

戴望舒高兴地为他俩详细地介绍左邻右舍国籍与身份，有的是作家，有的是诗人，有的是教授，都是和笔杆子打交道的。戴望舒和夫人穆丽娟、女儿同朵朵住二楼，很宽敞，他极力欢迎端木和萧红搬到他们这儿来。戴太太也热烈欢迎他们来同住。

端木与萧红也觉得环境非常好，他们到香港的目的也是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东西，“林泉居”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但不巧的是，端木风湿病又犯了，出入“林泉居”要走一段不短的山坡小路，加上刚刚在金巴道纳士佛台租了房子，马上就搬也不太合式。因此，萧红看看端木，对戴望舒夫妇说：“还是过一阵子再说吧。”

没多久，孙寒冰来港办事，告诉端木，大时代书店隔壁已腾出了房子，同在尖沙嘴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是三号，希望他和萧红能搬过去，对编“大时代丛书”有许多方便。萧红因对房东小姐不喜欢，立刻就同意了。

1940年春，由于孙寒冰的关系，端木和萧红搬到

九龙尖吵嘴今巴利道纳士佛台三号二楼，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房间对面是《经济杂志》主编许幸初的办公室。许幸初不常来上班，即使来，也坐不了多久，处理一下事务就走了。有电话可以使用，有朋友来，还可以在他办公室接待，就像是他们的客厅一样，非常方便。端木和萧红都比较满意。还请了一位计时保姆，按时来打扫卫生。尽管生活不太富裕，但在小窝内也其乐融融。

屋里放了一张大床，一张大写字台，仍然是两人相对而坐，各人铺摆自己的稿子。

端木写作时，一时想不起用什么词确切，常常会直愣愣地盯着前面看。

萧红坐在他对面，低头专心地写着、写着，偶一抬头，见端木盯着她看，不禁娇嗔地：

“你看什么呢？”

端木猛地回过神来：“我什么也没看呀。”

萧红不依地：“你坏！你明明是盯着看我来着！”

端木也调皮地笑着：“我自己的老婆还不让看呀？”

萧红不饶地拿着笔伸过手来敲了一下端木的脑袋：“我不和你面对面的坐着写东西了！”说着就要搬挪稿子。

端木忙按住：“别搬，别搬我不看你还不行？”接着，身子往后一靠说：“我在想，你这部长篇应取你家

乡一条河作名子,什么‘泥河’、‘土河’都不合适!”

萧红想了一下说：“我家是呼兰县，县里有一条河，叫呼兰河。”

端木听了,高兴而肯定地大声说“:好!你这部长篇，就叫《呼兰河传》。从你童年写起，就象呼兰河一样涓涓流过，你跟着这涓涓流水成长……多美！”

萧红也高兴地说：“好！就叫《呼兰河传》!”

端木乘机：“那，请我去吃一顿，犒劳犒劳我！”

萧红起身拿了钱，转身又赏给端木一个“响吻”，高高兴兴挽着他就下楼上小馆去了。

40 年 2 月，中华文协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会餐会，邀请端木和萧红介绍重庆开展抗战文化的情况，萧红谈到重庆文化食粮还是很缺乏的，香港应该多往内地输送“;三·八”妇女节时，廖梦醒还约请萧红参加纪念会，谈女学生和“三八妇女节”问题；《大公报》“学生界’’栏目,还聘请端木、刘思慕、许君远、李纯青等担任“每周创作研究”指导。在端木指导下，黄涛的文章发表在“学生界”上，同时附有端木指导的意见，对学生文学创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颇得学生好评。学生反映《大公报》开辟的“学生界”，在每周创作研究的先生指导下，才成了真正的学生园地了。4 月中，端木和萧红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第二届年会，端木被选为候补理事，和施

蜇存一起负责文化研究班的工作，还应邀参加岭南大学组织的“艺文社”，谈抗战文艺的一些问题。

端木和萧红都热衷于创作，不愿出去参加什么活动。但宣传抗日的责任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参加。他们到香港后，不用跑警报，不用担心逃难，觉得比较平静，思想里早就蕴酿要写的题材，就象开了闸的水一样奔流出来。他们白天出去参加活动，晚上就开夜车写文章，彼此把自己的时间挤得满满的，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彼此的体质又都不好，有时端木白天要参加各种会，常常早上出去，要到深夜才能回来。萧红独自在家写东西，广东保姆的语言又不通，常常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觉得有些寂寞。她常和端木说，还不如回内地好。

端木也觉得香港尽管目前没有战争，但和抗战气氛热气腾腾的内地比起来，也还是有些孤寂的。5月得知重庆大轰炸，孙寒冰不幸遇难，端木和萧红深为悲痛，端木写诗文痛悼这位为抗战文化事业奔波不辞辛劳的战友，更加深了要回内地的念头。但往哪里去，这是得考虑好的。

萧红说还是写信和华岗商量商量好。端木就要她给华岗写信。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华岗回信。信中说香港也非久留安居之地，因之，端木和萧红仍在考虑往哪儿去的问题。

这期间,端木的长篇《新都花絮》、《蒿坝》(出集

时改名《江南风景》）、萧红的《呼兰河传》、《后花园》等长短作品,分别在《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学生界”、“文艺综合”等报刊连载。

1940年6月，香港文协筹办纪念鲁迅先生诞生60周年大会。杨刚来找萧红，对萧红说：

“只有你见过鲁迅先生，只有你才能形象地将鲁迅先生搬上舞台，你来写个剧本，我们排了演出纪念他。”

萧红从未写过剧本，不知从何下手。

端木也觉得话剧不易体现。鲁迅先生要在台上说话，除了他演讲，其他的场面说什么呢？

这可难坏了萧红……

端木猛然想起他在南开上学时，曾经看过一位外国哑剧大师的表演，不如用“哑剧”的形式来写鲁迅先生。他马上把这个想法告诉萧红。

萧红高兴地说好！但具体怎么写，也还是没法下笔。

端木看着萧红发愁的样子，禁不住怜爱的自告奋勇，要萧红提供素材，由他来起草。不到两天时光，他就将提纲写出来了，两人再互相研究、补充后定稿。

端木的终生遗憾是没有见到鲁迅先生。但送葬时，鲁迅先生遗体上盖的“民族魂”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因此，哑剧写成后，他脱口而出，说应以

《民族魂》命名。萧红很赞成。第二天就向杨刚交卷了。

杨刚接到剧本很高兴。看后，硬要端木来扮演鲁迅先生。

端木从未演过戏，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实在接受不了，多亏萧红帮他解了围说：

“端木化起妆来不会像鲁迅先生，他演不合式。”

当时唯一见过鲁迅先生的“权威”说话了，杨刚这才作罢。

事后，端木好一通感谢萧红，因为杨刚当时那架式，是非要端木扮演鲁迅先生不可的。

1940 年 8 月 3 日，香港文艺界联合举办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60 周年大会，萧红根据鲁迅先生自传，在大会上介绍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晚上演出根据哑剧《民族魂》编排的大型节目及话剧《阿 Q 正传》等。演出结束后，萧红还上台参加谢幕。

10 月 19 日，端木萧红又参加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会。

10 月 21 日—31 日，《民族魂》以萧红的名义在《大公报》副刊连载，结束时，附作者的话，也是端木手笔：

“鲁迅先生一生所涉至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尤其用不能讲话的哑剧。所以这里我取冷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淀，来和他周围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

同时，端木的《略论民族魂》也在《星岛日报》“星座”上发表。

11 月 4 日《星岛日报》“星座”刊登启事：“《论阿 Q》因被有关当局检删太多,不能成篇,只得中止。”

端木写了一些介绍鲁迅先生及鲁迅先生作品的文章交给戴望舒，但到了有关部门审稿处，常常被删去一些字句和段落。遇到这种情况时，戴望舒尊重作者，总是将开了天窗的稿子送来给端木过目，端木同意才发稿，如不同意，就撤下来。有时为了向读者揭露审查者，干脆连着“天窗”一起登。但是这篇《论阿 Q》已被删得不能成篇了，所以就以“登启示”的方式告诉读者书报检查已到了何等程度。其实也就是一种斗争的方式。

1940 年 11 月前后,端木萧红结识了“国兴社”社长胡愈之。通过胡愈之的介绍，又与江北民主运动活动家周鲸文相识。周鲸文是香港颇具影响的杂志《时代批评》及时代书局的主人。他相当器重端木与萧红，马上就和他俩商议，由他出资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时代文学》。同他和端木任主编，他只挂个名儿，实则完全由端木负责。与此同时，筹建《时代妇女》杂志，请萧红任主编。周鲸文话刚说完，萧红立即说她身体不好，不能干。

周鲸文微笑地说：“什么事也不要你干,只要你挂

一个名，具体事都由下面人来干，甚至审稿也不用看。”

萧红是从不图虚名的，仍然坚决不干。

周鲸文自找台阶，婉转地说“：那就请萧红女士再考虑考虑吧。”接着就和端木商议筹办《时代文学》的具体事宜。

周鲸文具有典型东北人的性格，豪迈，讲义气。从他主办刊物《时代批评》的名字上，就知道他毕生追求的是什么了。他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好友。他在香港丰山有一幢房子，经常请朋友到家里喝咖啡、饮茶、聊天。朋友有困难，即解囊相助。爱结交文化界朋友，早就看过端木、萧红的作品，一旦结交，使引为知己。常请他俩到家来饮茶、便饭。他的夫人也很好客，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小姨妹见了作家，更是问长问短，盯住不放。这年圣诞节前夕，端木和萧红买了礼品，准备送去周家，临出门，戴望舒送“小样”来。因为等着发，端木要留下看稿子，就由萧红独自送去了。

端木到香港后，在写稿、编《大时代丛书》的同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编《时代文学》这样一种纯文学刊物，是很高兴的，他的抱负和才华能够有施展的地方。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将世界著名人物的头像，编在每期目录上面，向读者介绍。第一位就是鲁迅先生。

然后是高尔基、肖伯纳、茅盾、左拉、果戈理、伯林斯基、恩格斯、歌 、海涅、普希金、华盛顿· 欧文、契柯夫、肖洛霍夫……这些世界名人头像，要找画家画，首先得有资料。

香港是个商业城市，寻找进步文化资料，是很困难的。萧红也在为他想办法、出主意。后来终于在《世界文库》的扉页上，找到这些名人头像，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加之时间紧迫，找画家画是来不及了，端木只有硬着头皮自己来画。为此，萧红特意为他买了放大镜。好在端木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过美术学会，学过一阵子素描，所以画出来还看得过去，受到萧红的表扬。

端木在画鲁迅先生头像时，对萧红说：

“我不想将鲁迅先生画成‘剑拔弩张’的样子,我想画出鲁迅先生悲悯的神态。”

萧红非常赞成,并说“鲁迅先生对世人就是很慈祥的，对敌人才是横眉冷对呢。有几个敌人会去看？更多是人民大众呀！”

端木高兴地竖起大拇哥说：“真是英雄所见！”

端木开始画了起来。但连画了两张不满意，在裁纸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划破出血了，怕萧红骂他，也没吱声，想起读书时，常常用墨汁来涂伤口，便顺手把划破的手指往墨汁动里捅了一下，拿出来后，看着手指上的墨，忽然想起他家乡的清代名画家高其佩，

就是以手指作画的指画家。端木不禁也用醮了墨汁的手指在纸上画起鲁迅先生头像来。没想到画出来比用笔画得好，特别是在神态上，有一些悲悯的味道。端木得意极了，忙叫萧红过来看。

萧红过来看了说：“哟！真不错！快署上名字。”

端木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会画画，略为想了一下，提笔就署上“金永霓”三个字。

萧红“：何典？”

端木“：楚词，‘虹霓纷其朝霞兮！’也就是曙光在前的意思！”

萧红不禁赞赏地说了一个字“：好！”并且要端木为她的新作《小城三月》画插图。

端木当然很乐意，但他对小说里写的哈尔滨不熟悉，不知从哪儿下手。萧红就具体地告诉他，要他画一架马车在大雪中飞奔，另外画一幅书中女主人公翠姨站在松花江畔，以及对岸的景色和近处的啤酒桶。

端木略略思考了一下，提起笔就在纸上画了起来。

萧红一直在旁边看着，待端木画得停笔打量的时候，她就从端木手中拿过笔，顺着马车飞奔的走向，题了篇名《小城三月》，并签了“萧红”两个字。

整个画面非常协调，两人看了不禁相视而笑。

端木皱着鼻子看着她：“赏个什么？”

萧红撅着嘴在他脸上又亲个响吻。这是她对端木

的最高奖赏。

端木就像孩子似的乐不可支。

年底，端木要在《时代批评》上发他赶写的《科尔沁前史》时，萧红为了回报端木，主动的为他题了篇名。

萧红在重庆的时候,就蕴酿写《马伯乐》。原先是叫《马先生》，端木觉得这不像个书名，便改成《马伯乐》了。同时也准备写《呼兰河传》，南洋的洪丝丝知道萧红写了《回忆鲁迅先生》，就来信要她将稿子寄去，要在南洋出版，萧红为了寄出的稿子应和内地发表的有所区别，上心上意地作了增删改动。她对创作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再加上短篇、中篇、散文、应急文章，几乎就没个喘息的时间。在端木赶稿、审稿、编稿开夜车的时候，她也不去睡，以致有些咳嗽、发烧。

端木这个从来被人照顾而不会照顾人的“老”儿子，和萧红在一起，也学会了不但用手摸摸萧红的额头，还会用嘴和脸蛋去碰碰萧红的脸和额头。最后，还是专门出去买了支体温表回来，对萧红说：

“相信科学!”要萧红含着试体温。隔了两分钟拿出来一看：“37.2”说明有点发烧。

但萧红说她的体温从来都是 37 度以上，各人体质不一样。

端木说不服她，买来退烧、治咳嗽的药她也不吃，拿她一点 办法也没有。

1941 年 2 月中，因为端木萧红住的尖沙嘴今巴利道纳士佛台三号要调整房子，他们就搬到尖吵嘴乐道 8 号，时代书店二楼一间房子里。仍然是一张大床，一张大写字台，仍然是面对面而坐。只是有抽屉的这面让给端木用了，因为端木编刊物类别太多，用起来方便一些。不过就这样，也常常是要用的东西找不到了，还得萧红一边骂，一边帮他找。

2 月下旬，香港文协分会在思豪大酒店开茶会，欢迎史沫特莱、夏衍、范长江等来港。要萧红当主持人。萧红和史沫特莱 30 年代在鲁迅先生家中见过，这次萧红来主持会，只是作了礼节性的欢迎，没有多谈。

过了 不久，史沫特莱突然到九龙乐道 8 号来看端木与萧红。上楼进门后，看到他们的住房这样简陋，竟惊讶地叫了起来：

“ 你们这两位大作家，竟然住在这么小的一间房子里，太不可思议了！…… 这怎么能生活？还创作作品 ?…… ”

端木苦笑地接待她，要她坐。

史沫特莱没理会端木的招呼,嘴里仍念着“: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 ” 转身拉着萧红的手，仔细地打量她：“ 瘦了，比我见到你的时候瘦多了！不过，更美丽了！更美丽了…… ”

端木乘机就向史沫特莱“告状”，说萧红身体不好，不看病、不吃药、不休息，试了体温表发烧，还硬说她的体温就是比一般人高……

史沫特莱听了皱着眉头说“：这怎么可以？健康是最主要的，特别是战争时期，我这次回美国，就是为了治病。”随即讲了国际局势；战火不但不会很快熄灭，还有扩大的趋势，香港也不是久留之地，不如去南洋，她可以为他们联系去新加坡。

接着，她要萧红收拾一两件换洗衣服，随她一起去香港主教罗纳德·霍尔的玫瑰谷去住些时，说那里很宽敞，阳光、空气都好极了。

萧红在犹豫。

端木说“：不妨先去看看。合适就住几天，不合适就回来嘛。”

萧红：“我走了，你怎么办？”

端木“：在家吃，有保姆，出去吃，有馆子，我会管好自己的。你就放心吧！”

萧红䀹了䀹眼睛，从小框子里拿了两件内衣，从抽屉里拿了一些钱放在提包里。同时告诉端木放钱的地方，便准备随史沫特莱走了。

临走，史沫特莱将玫瑰谷的地址、电话留下，欢迎端木有时间也去小住。端木问史沫特莱手头有稿子否？他主编的《时代文学》创刊号希望能有幸发表她的大作。

史沫特莱高兴地答应一定将稿子交给他，便挽着萧红下楼了。

萧红随史沫特莱住到玫瑰谷后，端木便废寝忘食地投入到编《时代文学》的工作中去了。他罗列了一系列名单，不论内地、延安，但凡有联系地址的，他都发了约稿信，他主编的这本刊物几乎要发全世界的名著。

他首先写信向许广平先生汇报，希望得到许先生手迹和海婴公子的相片；给华岗写信索稿，说有了自家的刊物，发自家的文章……，加上他写稿、讲课、参加会议，常常不在家，有时晚上也回来得很晚。萧红给他挂电话，常常为找不到他而着急。

一天夜晚，端木回来正上楼时，听到屋内电话铃响，他三脚两步赶到门口，拿着钥匙开门，连门都顾不上关就去接电话，但拿起一听，那边刚好挂上，他躺在椅子上动都不想动了。

半夜，电话铃响声将端木惊醒，急忙起来去接。

端木“: 哈罗…… ’那边没等问是谁,便响起了萧红着急的声音：

“ 那么晚了你都没回家,你到哪儿去了 我打一天电话都没找到你。”

端木立刻想起他上楼时听到的电话铃声，准是萧红打来的。便抱歉地说：“ 晚上我回来上楼的时候就听到咱屋电话响了，我只要紧赶两步，就肯定接到了。可

是亲爱的，我的腿不听使唤呀……”

萧红焦急地“：怎么？你风湿病又犯了？我不在家，你每天晚上还用热水泡脚吗？”

端木“：我没犯病，你放心！你怎么样？还发烧吗？还咳嗽吗？”

萧红在那边不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着急地“：我问你呢，你拿热水泡脚了吗？”

端木只得说“：泡了！泡了！每天晚上都边写东西边泡，和你在家时一样。”紧接着也是着急地：“你咳嗽怎么样？每天试体温吗？还发烧吗？”

萧红不耐烦地“：我根本不发烧！咳嗽好多了，这里环境很好。何鸣华主教的华语说得很好，史沫特莱很忙，常常不在，我很寂寞，我想你，我想回家。”

端木安慰她“：你才去了几天？那里环境好，就多住些日子，我把稿子发了就来看你，现在已经两点多了，你赶快睡觉吧，我的亲爱的，吻你！”接着对着电话送去一个响吻。

电话那边的萧红显然得到了安慰，声音柔和地说了一声“：小坏蛋！”就挂上了。

抽了一个星期天，端木穿得整整齐齐，过海叫了计程车，找到了香港大主教何鸣华的别野玫瑰谷。当他走完林荫道，便看见这栋两层楼房下面绿丝绒一样宽阔的草坪，史沫特莱和萧红正在阳台上饮咖啡。

“密斯特端木！”史沫特莱首先欢叫了起来，萧红

转身也见了他，便一起高兴地迎了下来。

萧红气色好多了，白里透红，不过端木拉着她的手时，仍感到手心里有灼热。

何鸣华主教不在家，他们玩得很自在。史沫特莱告诉端木，她正把在新四军收集的战士写的情报等资料给萧红看，说端木来得太好了，她已准备了十篇文章，要交给端木，在他主编的《时代文学》上发表，还有图片、照片……

她边说，边从屋里往外拿。甚赞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

端木对这些意外的收获，非常高兴，便向史沫特莱要了纸袋装起来准备带回去。并且告诉史沫特莱，她的这些作品和资料，会在《时代文学》上一篇篇地介绍和发表。

端木不放心萧红的身体，便将话题引向史沫特莱的健康。因为听说她身体也不好。

史沫特莱说不准备在香港看病，打算回美国去彻底治一治。关于萧红的健康，她通过何鸣华主教，联系了玛丽皇后医院，可以有一定的优惠，随时都可以去检查、治病、住院。这是香港最好的英国皇家医院。

这样，端木就比较放心了。

中午，他们吃了西餐，简单而富于营养。

午餐后，端木为了将史沫特莱的稿子和相片、人物介绍赶在创刊号上发出去，便告辞了。临走，要萧

红好好再住些日子，乘着史沫特莱在，可以去玛丽医院检查一下。萧红不置可否地和史沫特莱一起送端木走出大门。

由于原先约定的稿子，没能按时收到。为了《时代文学》创刊号能在 1941 年 4 月 1 日出版,为凑够篇幅、字数，端木使出浑身解数，日夜赶写诗词、散文、杂文、评价……中外古今几乎无所不包。但这些作品不能都用端木蕻良的名字发表，因此为起笔名也费了不少脑筋。如红楼内史、度曲郎、庄生、东方亮、野马、苦介亭、金泳霓等等，终于凑够字数，送到印刷所，报刊也开始作宣传，专等 4 月 1 日出版了。可三月下旬，办刊物的助手袁大顿跑来告诉端木， 4 月 1 日因故出不来了，得往后拖些时。端木知道印刷所不是自己开的，找周鲸文也没起到作用，只有等待，继续将第二期、第三期继续编下去。

4 月中，茅盾先生和夫人到香港，端木在开欢迎会的同时，请茅盾先生为《时代文学》撰稿，要发茅盾先生像、手迹。茅盾都高兴地答应了；周鲸文先生倡议人权运动、倡议营救张学良将军等活动，都得到文协分会的支持，端木写了一系列文章配合，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

这时，萧红来电话，她不准备在玫瑰谷住下去了，要端木去接她。

端木从电话中听出萧红的口气，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此，端木只得过海去将萧红接了回来。

尽管端木事先还将家中清理了下，和萧红一起进屋后，还是没有得到认可。不过家中有了女主人，也就自然带来了温馨，端木又有了“坐享其成”的福气。

五月下旬，史沫特莱定了回美国的船票。到乐道8号来向端木和萧红告别。并向端木、萧红要文章带去美国。

萧红拿出《生死场》单行本，题签后交给史沫特莱，请她带回美国赠给辛克莱。同时就手头的短篇交给史沫特莱带去美国发表。

史沫特莱说她一定带到，并留下她的地址。希望能互相通信、寄文章。临出门，还叮嘱萧红去玛丽医院看病。

史沫特莱走后不久，《时代文学》创刊号出版了。其中不但发了史沫特莱的文章《这样微小的事》，还发了利士卡介绍史沫特莱的文章和史沫特莱的照片及签名。

端木拿到《时代文学》创刊号，就立即给史沫特莱寄去了。

不久就接到她的回信，和辛克莱写给萧红的感谢信。说已经收到史沫特莱带去的《生死场》了，同时寄赠了他的作品给萧红。

萧红从玫瑰谷回来后，看到端木成天那么忙，心里有些着急，又看到他在《时代文学》第二期上要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大时代》，就责备他太贪多了。可端木觉得创刊号出来后颇得好评。这样一种纯文学大型刊物，得想尽一切办法办下去。萧红觉得也对。但她不想在《时代文学》上发表更多的文章，免得人家说嫌话。因此她写的长篇和短篇，多半发在《时代批评》和一些另外的报刊上。在这些方面，端木觉得必竟是女士想得比男士周到。

一天晚上，端木冒着暴风雨从外面回来，进门看见室内窗户未关，窗帘被风吹得鼓起好高，而萧红却躺在床上睡着了，他急忙关好窗子，来给萧红盖上毯子。

萧红醒了，问："几点了？"

端木："快 12 点了，你怎么睡觉也不盖东西呢？"

萧红："我有些头痛,就便躺下,没想到睡着了。"

端木急忙摸萧红额头："糟糕！发烧了！"急忙打开抽屉取体温表。

萧红："又大惊小怪了!"

端木一边用酒精棉擦体温表往萧红嘴里放，一边焦急地说："这回决不止 37 度！"

萧红含着体温表说："你就赶快泡脚吧，12 点又过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在 12 点以前上床呀?都是你这小懒虫，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端木“：别说话了，你就试你的表吧。”拿着水壶就到卫生间去洗脚了。一会儿端木出来，看见萧红拿着体温表就着床头灯看，便问“：多少？”

萧红慢条斯理地“：怎么我没什么感觉呢？”

端木着急地“：多少？”

萧红：“38 度多。”

端木一把拿过体温表，就着灯光转着，好不容易看到了水银柱已经紧靠 39 度了，大声地：“都 39 度了！不行，我打电话叫急救车！”

萧红急忙起来拦住“：你什么大财主？发一点烧就要叫急救车？38 度多也不算太高嘛！等天亮了，如果烧不退，咱们就到玛丽医院看病去。”

端木心想：谢天谢地，萧红总算愿意去玛丽医院看病了。于是依了萧红，没有打电话要急救车。但是，端木一夜几乎未合眼，时时用手摸萧红脑袋：烧退了？还是高了？……倒是萧红咳了一阵后，在他怀里睡着了。

早上醒来，萧红体温稍稍退了一些，但头痛却加剧了。

端木打电话，请袁大顿过来陪他们去玛丽医院看病。因为袁大顿是广东东莞人，在语言上可以当翻译。

袁大顿很快就来了。叫了车，端木扶着萧红上车，到海边上了轮渡过了海，又叫车到了玛丽医院，找到史沫特莱留下名字的医生，很顺利地为萧红看了病。

大夫态度很好，建议还是先住院彻底检查一下，费用是遵照罗纳德 · 霍尔主教嘱咐的优惠价收取的。

端木当然很感谢。

袁大顿去问了头等、二等、三等病房的价格，都是成倍增长的。

端木和萧红核计，既然是作检查，住不了几天，就决定住三等的。告诉院方，预交费用，下午送来，领了住院证，便将萧红送入病房了。

端木要萧红安心躺下，下午会将漱洗用具送来。

萧红情绪也不错，笑着说："还没为检查身体住过院呢。这回检查检查也好放心。"

端木也笑着拍拍她，便和袁大顿回九龙准备筹钱去了。

端木萧红在香港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是，稿费和住院费是无法成正比的。玛丽医院尽管给予优惠，也还是差得很多。为此，端木不得不首先向周鲸文谈了萧红需住院检查的情况。

周鲸文很爽快，告诉端木，要萧红放心，一切费用都由他负责，把病治好是主要的。随即开了支票，要袁大顿去医院办理。

下午，袁大顿去送支票时，来找端木取萧红的漱洗用具，由他带去，就免得端木再跑一趟了，因为他知道端木腿也不利落。

但端木知道，如果他不去送东西，萧红肯定会不

高兴，同时他也不放心，便清了东西，买了水果和袁大顿一起过海到玛丽医院。袁大顿去交费处办手续，端木直接上病房。

萧红看见端木来了，很高兴。告诉端木，她的头痛好多了，还向端木介绍了同房的病友，告诉端木，医院探视病人是有时间规定的，要端木记住。说着便从手提包里拿了小本，将时间写上，撕下放在端木西服上衣口袋里，免得端木记不住。

端木笑着说：“这点时间，哪会记不住呀？”

萧红仍不放心地：“对你可说不好！”

这时，袁大顿办了手续来到病房，摇着脑袋说：“还是优惠呢，一天住院费，就够老百姓一月伙食费了。”

萧红担心“:很贵吗?”

端木忙接过来“:这你就别管了。周先生开了支票来了。”

萧红“:好说,有财东作后台,就住几天吧!”看看铺后说“:你们回去吧,到时间了。我送送你们。”说着便换鞋。

端木“:你别送了,我们又不是小孩,你就好好躺着吧。”

但萧红执意要送，没想到了这个病区门口就被拦住了。只得乖乖地说“再见!”

萧红经医院确诊为肺结核后，就从普通病房搬到隔离病房了。那时对肺结核病人的治疗，主要是空气与阳光，休息与营养。人称：“富贵病”。有钱人得了不怕，穷人得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玛丽医院的结核病房区，是一溜临海宽敞的阳台，一排间隔的病床。面对无垠的大海，阳光明媚，空气清新。

萧红搬到这里，开始是很喜欢的。曾发奇想：要是端木也能搬来和她同住，那该多好！并对端木说，以后出院了，也找一处临海的房子住。端木也爱大海，完全同意她这个想法。

萧红的肺结核病是相当严重的。 X 光检查，两页肺上均有空洞，需要打空气针治疗。

萧红很害怕。但医院方面坚持这样的治疗，否则空洞不能愈合。

端木拿不定主意，征询了周鲸文夫妇、于毅夫夫妇，还有夏衍。他们都说肺部有空洞，打空气针，还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治疗肺病的方法，病人当时可能有些痛苦，但过后就会习惯的。

于毅夫和周太太还去医院看望了萧红，劝她进行空气针治疗。

萧红后来也想通了，既然住在医院里了，也只有听从医生的了，第一次打空气针后，萧红痛苦得嚷嚷不如死了好！但过了一两天，便觉着不那么蹩气了；进

行第二次、第三次后，就没什么太大的反映了；咳嗽也减轻了，胃口也好了，嚷嚷想吃罐头了，端木买去她最爱吃的凤尾鱼罐头后，她还说端木“扣门儿”，一次才给她买一个。

其实端木一次就给她买了一大合，只是怕她凭着性子吃，一次能吃两三个，所以每次去看她只给她带一个。当然！端木看着她爱吃，还是很高兴的。

10 月份的香港，气候宜人。

萧红倚着床栏，面对大海，又进行创作了。

端木每次按规定时间去看她，她总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向他介绍旁边病人的情况。有一次孙夫人宋庆龄还来看望那边一位病人，据说是位工人，孙夫人是来慰问她的。萧红告诉端木，她真想过去和孙夫人握握手。舞蹈家戴爱莲，也在这个病区住过一阵子。

端木见萧红病情日渐好转，心情也不错，袁大顿能按时来取《马伯乐》下部的稿子，也就比较放心了。

萧红住院后，端木除去探视萧红的时间外，全身心地扑在编《时代文学》和创作上。由于《时代文学》发行后，反映不错，各地来稿也就多了。丁玲来信还介绍延安作家雷加的小说《旅港东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端木代萧红签了字。

九月的一天，端木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叫骆宾基，是从内地来的一个青年作家，到香港后，找不到工作，现在困居旅店，请求能够给予帮

助。

端木马上想到鲁迅先生对待青年人的态度，立即问清骆宾基在香港旅店的地点和名字，要时代书店的张慕辛和林泉按地址去了解情况，既然是位从内地来的青年作家，理应尽可能的给予帮助。并打电话告诉周鲸文，是否可以将这位青年作家安置在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周鲸文同意。张慕辛找到骆宾基，为他付了旅店的钱，取出行李，就搬到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了。

端木为了使骆宾基有稿费生活。便在《时代文学》第五、六期合刊上，撤下自己的长篇连载《大时代》,换上了骆宾基的小说《人与土地》,骆宾基很感激。

香港气候由秋季转入冬季后，虽不算冷，但玛丽医院阳台式的结核病区，就不如夏季秋季那么舒适了，特别是海风变凉了。

萧红觉得不适应，想出院，端木也怕她经不住海风吹，万一病还没好，又感冒了怎么办？就去找医生。

医生对端木说“:你太太的病很严重,两边肺上的空洞，进行了这几个月的治疗，继续扩大被控制住了，但离出院还很遥远。你要劝你太太打消出院的念头冬季到了，我们医院是会采取措施的，怎能使住院的病人患感冒呢？”

医生这一席话，使端木凉了半截。他回到萧红身旁不敢照实说，只告诉萧红医生说治了这一个疗程再说。萧红以为没几天了，也就没嚷嚷要出院了。

一天夜里，端木在家专心赶稿。外面正辞 12 级台风，窗户被吹得呜呜呜直响，似乎不吹开决不罢休的样子，端木什么也没感觉到，只听到笔尖下唰唰的声音。

忽然电话铃响，端木拿起电话，原来是医院来的，说“萧红病危！”

“什么？”端木如遭晴天霹雳，再问时，那边已将电话挂了。

端木放下电话，什么也不顾地带上门就往楼下跑，出门一阵风，几乎将他吹倒他这才想起今天的天气预报说，有 12级台风。

此时，就是 24 级台风也阻拦不了他，他一边走，一边想：萧红怎么会病危呢？昨天从她那儿回来还好好的呀……

到了海边，轮渡停了，什么渡船都没有了，只有狂风刮着海水撞击海岸的声音。端木正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老船夫划了划子过来问他是不是要渡海？

端木如遇救星,感激地忙说“要渡海要渡海！”说话之间，就踩着水爬上小划子了。

老船夫“给几多？”

端木“:你要几多就几多!”

老船夫:“12 级台风哪,你看着给吧!”他要端木坐好，抓牢船边，就往对岸划去了。

端木告诉老船夫划到离玛丽医院近的码头靠岸即可。

老船夫很有经验，并不像想象中在 12 级台风下的海上行船。

到岸后，端木抽出一张 10 元港币给老人,老人忙说“:找不开,找不开!”

端木“:不用找了!”便上岸叫车到医院。直奔萧红病房而去。

整个医院静悄悄的，大阳台上除了棚布被风鼓起的声音和海水击岸的声音，都没什么异样。他轻轻走到萧红床前，看见萧红侧着身子睡觉。

萧红听到声音，睁开眼睛看见端木在床边喘气，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

端木看到萧红好好的，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傻笑了笑。

萧红关心地:“今天是 12 级台风呀!”

端木“:敢许就是 12 级台风把我吹来的。我要看看你们的病区在 12 级台风下情况怎么样?”说着，便去找护士问怎么回事?

护士说她是刚刚换班的,没有打过电话。要打,就是上一班护士打的，一定是她打错了。

端木非常生气，对护士说："医院护士，在这样的问题上，怎么能打错电话呢？"

但是这位护士也无法回答，端木只得不了了之。在往萧红床边走的时候，心里忽然有一种不祥的兆头，就像一朵乌云在脑袋顶上一样……

当他走到萧红床边，看见萧红因他来而显得高兴时，那压在脑袋顶上的乌云才散了。

萧红告诉端木，她在医院结识了一位北方女友，叫金秉英。

端木："那是萨空了的夫人，怎么？她也住院了？"

萧红："不是，她是来看朋友的。我们在电梯里听到彼此都是北方口音，就交谈起来了。她和她先生都爱好文学。"

端木告诉萧红，他认识他们夫妇，还向他们约过稿子，并且告诉萧红，文协要召开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

萧红没等端木说完，立刻道："我要出院，我要参加！纪念鲁迅先生的会，我怎能不参加呢？"

端木："那得医生同意才行呀。"并且安慰她说："我正在托人找面临大海的房子，找到了就来接你出院。"但很显然，萧红住医院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

10月19日，文协在福建商会举办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端木在会上见到柳亚子先生。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由于爱国、正义，受到

“通辑”，带着夫人和女儿辗转来到香港。端木早就慕名，见面即成忘年交。柳亚子诗文横溢，出口成章。端木向他求诗，一挥而就。在 11 月 1 日出版的《时代文学》 5、6 期合刊上，辟了纪念鲁迅先生专刊，发表了柳亚子、周鲸文、陈君葆、胡绳、林平、于毅夫等的诗文。

11 月中，端木和袁大顿一起去医院看萧红。袁大顿告诉萧红在《时代批评》上连载的《马伯乐》下部，再发一期就没有稿子了，下面怎么办？

萧红直愣愣地对袁大顿说：“不行！现在没心思写长篇，你就替我在《时代文学》上登个启事，就说‘作者生病,暂停’。”

袁大顿看看端木。

端木“就这么办吧！”

接着，萧红又嚷嚷要出院。端木说待他问问周鲸文的意见，因为住院费用都是周鲸文资助的，出院与否，也得向周鲸文打个招呼呀。

这才使萧红暂时平静下来。

没几天，香港文协分会在漫莎餐厅为郭沫若举行‘祝寿会”,柳亚子、茅盾、端木等近百人都参加了。会后，柳亚子邀端木到他寓所询问东北沦陷史。柳亚子听了端木的讲述后，悲愤地即席题诗赠端木，并呈萧红。

端木拿着柳亚子赠诗去医院给萧红看，恰逢于毅

夫先生也去看萧红。萧红身边放着大包小包，端木感到很奇怪。

萧红高兴地告诉端木：“于毅夫先生来接我出院了。”

于毅夫说“萧红既然那么想出院，看她目前的情况，硬要她住在这医院里反而不好。不如出院试试看，不好再回来嘛。肺病之人，心情是很主要的！”

萧红：“毕竟年长的比你知道得多，咱们赶快走吧！”

端木要给周鲸文打电话。

萧红着急地“回去再打吧。”

端木无奈，只得和值班护士说家中有事，回去几天再来，好在还不结账呢。

这样，便将萧红接出院了。

萧红到家，高兴极了，往还未叠被的床上一坐：“终于回来了！”

端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接回了萧红，看见屋里实在脏乱得不像样，只有硬着头皮等挨骂了。但由于萧红情绪好，一时竟未顾上。

第二天，太阳老高了，他俩还没起床。萧红很兴奋，也很疲乏。

这时，外面有敲门声。

端木急忙起来问“谁？”

外面一位老者的声音“是我。”

端木一听，是柳亚子先生，慌忙告诉萧红。

二人急忙穿上衣服,铺好被子,萧红进卫生间,端木便去开门。

柳亚子先生笑咪咪地走进来，说他去九龙医院看女儿，顺便来看看端木。

端木接待柳亚子先生坐在书桌边，一边为他沏茶，一边说：“萧红昨天出院回来了。”

这时，萧红梳洗了一下出来，红红的脸蛋，一双闪亮的大眼睛，高兴而尊敬地向柳亚子先生问好。

柳亚子握着萧红的手，眯着眼睛端详说：“才女！早就久闻大名了！幸会。”

萧红微笑着，多少有几分忸怩：“这怎么敢当呀？我们还得请柳先生多多指教呢。”

端木担心萧红身体不支，将被子叠好放在床头，要萧红靠在床头说话。同时告诉柳亚子，萧红刚出院，怕她累着。又转身告诉萧红：“柳先生是长辈，不会介意的。”

柳亚子也说:“对,对,快躺下,我可以把椅子挪到床边来谈话。”

萧红只得顺从地靠在床上。端木忙将柳亚子的坐椅挪到床边。他们相见恨晚地聊了起来。

柳亚子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到书桌旁，提起笔赠诗与萧红。

“谔谔曹郎奠万华，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侍一茶。

长白山头期杀贼，黑龙江畔漫思家。

云扬风起非无日，玉体还应惜鬓华。

柳亚子边念边写，写完抬头看看端木与萧红，将诗又从头至尾念一遍后，双手拿起送给端木。

端木忙躬身双手接过"：能得柳先生墨宝，太荣幸了。"

柳亚子转身和萧红握手告辞："贱内还在家等着呢。"

萧红要起来送，被柳亚子制止了。萧红在家住的这些日子，柳亚子常来和她聊天，萧红觉得很愉快。

袁大顿知道萧红出院，到家来看萧红，告诉端木和萧红，他已定于 12 月上旬回广东东莞去结婚。同时谈到这几天外面风声有些紧，如果港九有什么骚乱，欢迎端木萧红到他家乡去。乡间房子还是可以的，粗茶淡饭也是招待得起的，希望他们不要嫌弃。

端木和萧红忙恭喜他，希望他结婚后带喜糖来吃。

临走，袁大顿还依照萧红的要求，和端木把原来顺着墙放的床，挪到中间来一点，以便两边都能上下床。这位年轻人，从来都是乐呵呵助人为乐的。看看没有什么事，便回书店去了。

金秉英知道萧红出院，也常到家里来看她。萧红和秉英非常谈得来。只要两三天没来，端木不在家，她

便写条子要保姆去请金秉英来聊天。

萧红出院回家后，从精神、言谈上看，比在医院里要好得多，端木挺高兴。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萧红咳嗽又加剧了，体温也开始升高了，头痛又开始了。端木不得不又将她送回医院。好在医院护士都熟悉她，端木还是比较放心的。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逃往内地。端木住的九龙乐道楼上，就能看到铁丝网和炮火。端木立即过海将萧红接回。

萧红非常害怕，要端木打电话，请柳亚子先生来，商量怎么办。

这时，端木接到骆宾基电话，说香港眼看要打起来了，他准备回内地去，特向端木辞行。并致谢。端木心想，骆宾基光杆一人，不如请他留下来，帮助自己照顾一下萧红，以后可以一起走。因此，就把这个想法向骆宾基说了。

骆宾基说当然可以，能够协助端木照顾萧红女士，对自己是莫大的荣幸。当天，便从香港过海来到九龙乐道 8 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到端木萧红的家。

端木介绍骆宾基和萧红认识，并且告诉萧红，这就是那位困在香港旅馆的青年作家骆宾基。

骆宾基仰慕地和萧红握握手，便默默坐在一旁了。

柳亚子接到端木电话也来了。他一进门便说“：我小女儿听到大炮声不断，起先还以为是演习呢。”见萧红特别害怕，便安慰她，和她聊天，互相作诗。

萧红对学术界的长者，从来都特别相信和尊重，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这时，于毅夫急匆匆地赶来告诉端木，今晚得过海到香港那边去。九龙保不住，很快会沦陷。他已经预定了小划子，等天黑下来就走，要大家准备一些吃的、用的。

端木随即收拾东西，送柳亚子回去，同时买一些食品回来。

天黑以后，枪炮声更紧，端木和于毅夫、骆宾基雇了两辆三轮车，扶着萧红上车到海边，乘上雇好的小划子过海，就直接往时代书店，准备找张慕辛林泉他们，先有个落脚处。

时代书店的店员告诉端木，大炮响了之后，张慕辛、林泉住到思豪大酒店去了。于是，端木这一行人就着原车赶到了思豪大酒店。这已是第二天清晨了。

思豪大酒店的女老板，是个东北人。和时代书店的人都很近乎。张幕辛和林泉想找钢筋水泥结实的楼房住，又知道张学铭长期包的思豪大酒店五层楼的房间，一直是空着的，所以他们就通过女老板住进去了。

现在看到端木萧红来了，萧红还生着病，便毫不犹豫地将这套房子让给端木萧红住了，他们又住到别的空房子里去。

端木和萧红在香港有了临时落脚处，端木便托骆宾基照看萧红，他和于毅夫一起出去了解情况。

香港整个局势越来越糟，越来越乱，一些“烂仔”也乘机出来抢劫，水、电、交通都停了，不论到哪里就凭两条腿。

端木从于毅夫那里知道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已经致电廖承志，尽快地接出滞港的进步文化人。于毅夫还告诉端木，过几天要在格罗斯打大酒店地下大厅召集滞港文化人，布置撤走事宜。但是，于毅夫知道，这些撤走的行动，萧红都因为生病无法参加。不过有什么他会来告诉端木，并要端木有事便来找他。

12 月中旬，外面大炮声不断，端木正在酒店房间炉子上为萧红做吃的，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大楼都震动了。骆宾基仓惶夺门而出，端木急忙放下碗跑到床边搂紧萧红。这些天的逃难，很明显，萧红的病体加重了。到晚上稍稍平静后，骆宾基显然在外面吃饱了，才上来对端木说，酒店的人都往半山一幢空别墅里跑，我们是不是也去那里躲一躲？至少不会被炮弹打死。

于是端木和骆宾基扶着萧红，两步一走，三步一歇地到了半山腰一幢空别墅里，那里的主人显然早就

撤离了，端木看那情况，最多也是临时避避炮弹，根本无法在那里生活，便要骆宾基照看萧红，自己再去找于毅夫。

于毅夫也有些一筹莫展。不过他想到周鲸文的房子在半山腰，那里比较安全，便准备将萧红送到周家。那时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了，只有用高价请了两位搬运工，把躺椅绑在两根木杆上，抬着萧红，一起到了周鲸文家。

周家人很多，看到萧红被抬来，周鲸文夫妇也还是很亲切热情地让到客厅沙发上躺着，一方面安慰萧红别害怕、别担心，一方面考虑如何安置才合适。和端木、于毅夫商议后，决定还是暂时住坚固的大饭店比较保险，比较方便，随即，住进了格罗斯打大酒店。

香港在飞机炸弹、大炮轰击下，很快被日军占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所有大医院、大饭店，一律军管。萧红住的格罗斯打大酒店变成了日军司令部。端木扶着萧红只有立即搬出，暂时到了一个裁缝铺里躺着，等端木找到地方后再来接她。

端木又去找周鲸文，周鲸文要人协助端木将萧红从裁缝铺暂时抬到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去住下再说。那里人倒不挤，还有一间小屋给他们住。

由于战乱，往返搬迁，吃不好、睡不着，萧红除了咳嗽、发烧外，又增加鳖气，时常会觉得透不过气来。人更瘦了，脸更白了，眼睛更大了…… 端木心急

如焚，说什么也得让萧红住进医院治疗才行。

端木只得又去找周鲸文，在香港酒店门口，遇到萨空了，谈了谈朋友们撤退的情况和萧红的病。萨空了问端木干什么去，端木告诉他找周鲸文。萨空了说他知道周鲸文在交易所。他刚好有事也要往那边去，便一同去了。端木找周鲸文主要是借钱设法为萧红看病。

圣诞节那天，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战事停了。交通、水电也逐步恢复了。但医院仍被日军占领。

于毅夫来告诉端木，在有关方面安排下，30 多位文化人由东江纵队保护，撤离港九地区。端木、萧红均在名单上。但萧红病成这样是无法走的。于毅夫又告诉端木，他也要走了。他走后已安排了王福时协助你们撤离，并交给端木一笔钱，以便为萧红治病和撤离用。

那时，柳亚子还没走，但凡萧红精神好一点，便要端木给柳亚子挂电话，端木挂通后便将话筒递给萧红，能听到柳亚子的声音，对萧红也觉得是一种安慰。

1 月 9 日从电话里知道柳亚子要陪何香凝撤离香港回内地了，萧红便要端木带了还没有启封的鱼肝油去送给何香凝，代表她去送行。

到了柳亚子那里，柳亚子详细询问了萧红的病情，安慰端木，只要停战了就好办了。临走，也送了一些钱给端木，表示他的心意。

端木有了钱,什么也不顾了,先找到医院再说。从当地人那里打听到跑马地，有一家颇具名气的私人开设的医院。院长李树培是位博士。香港有钱人多半去他那里看病，条件设备都是一流的。听说没有被日本军队接管，端木就按地址找去了。

养和医院不大，但很考究。它已经开始接待病人了，端木急忙去办手续。院方要先交一周的预金，端木拿出港币交付，院方不收，日军占领后，市面上港币美金都不收了，得兑换成“军票”。

端木看没有通容的余地,便出来兑换“军票”。那时，满街都是兑换“军票”的，既没有牌价，也没有银行兑换处，胡乱在票贩子手里兑了几百元军票，回到医院交了预定金，马上回去接萧红。

当端木急匆匆进门的时候，骆宾基不小心将床边茶几上的杯子碰掉在地上了，萧红正蹩得喘不过来。

端木立即扶萧红坐起来，一边为她拍脊背，一边对骆宾基说：“快！我已经找到医院了，你赶快收拾一下萧红的漱洗用具，咱们这就走。”

萧红靠在端木身上，蹩气稍为好了一些，脸也不那么红了。端木吻着她的头发说：

“亲爱的,现在不怕了。我找的这家医院是香港最好的，钱也有了，你就安心的治病吧！”

到了养和医院，第二天，李树培院长亲自来作检查。当他知道端木、萧红是当时香港文化界有名之士

时，态度稍稍好了一些，他检查的结果是萧红喉头有肿瘤，需要手术切除。否则就有封喉的危险。这就是感到蹩气的原因。

端木一听就急了。因为他知道有结核病的人是不能开刀的，开了刀根本封不了口。他的二哥就因为有结核病，腰上长了东西，开刀后一直封不了口，已经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因此坚决不同意开刀。并将二哥的例子说给李大夫听。

李树培大夫微笑了一下：“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端木“：当然听大夫的。”

李树培“：那么签字吧。”

端木不签字。

萧红治病心切说：“开刀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婆婆妈妈的了，你就签字吧！”

端木坚决地“：我不签！”

萧红发急地：“你不签，我签！”说罢，自己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李树培拿着签字单就走出病房了。

萧红几乎平躺不下来，端木为她把床摇起来，蹩气才稍稍好一点。这也就怪不得萧红自己签字了，但愿这手术能解除她的痛苦。

这时，护士推来了手术床，将萧红抬上去就推走了。端木紧紧跟在后面，进手术室时，萧红还回过头

来看了端木一眼。随即手术室的门就将端木隔在了外面 。

端木这时真是坐立不安，在手术门外，可以听到刀钳和盘子碰撞的声音，一会儿又什么都听不见了……这时间，不知过得是长还是短。不大工夫，手术室门开了，萧红躺在手术床上被推了出来往病房去。端木乘机溜进手术室，想问问大夫开刀的结果，看看切出的瘤子，但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盘子里一堆带血的药棉。

端木随即出来到病房，护士已将萧红抬到床上。端木看着萧红气色还好，脖子上缠了纱布，一根橡皮管从纱布中露了出来，插到一个瓶子里。萧红精神还不错，但眉语间透着焦虑。

端木靠近问她感觉怎么样？

萧红声音很低很低地对端木说：“我觉得胸痛。”几乎用气音又说：“我听到大夫说，没有肿瘤……”

端木惊呆了！

但事已致此，怎办？他翻身入内，去找李树培，护士告诉端木：“院长作完手术就走了。到哪儿去，我们也不知道。”

端木只得蹩住火，回到病房安慰萧红。

萧红低声说：“这里不能住，咱们还是到玛丽医院去吧。那里有专治肺病的。我是老病号，他们会接纳的。”

端木也和萧红同感。但玛丽医院离养和医院有几十里，再说那里接不接纳病人还不知道，但为了救萧红，端木还是决定跑一趟。

端木将萧红托付给请的一位荷兰藉的女特护，便出来找车，但车全被征用了。正一筹莫展，忽然听到路边有用英语谈话的声音，有一个青年人还戴着“朝日新闻”的红臂章。端木想，日本也有“反战分子”，硬着头皮上前就用英语自我介绍了：“我是端木蕻良，我的妻子是萧红，她病得很重，我需要车子送她去玛丽医院，不知你们能不能帮助我？”。

他们似乎知道这两个名字，便要端木随他们到办公室，告诉端木他们是“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另一个还将他的名字告诉端木叫“小椋”。他们马上为端木派了车，连夜将萧红送回玛丽医院。因为萧红不久前是这里的病人，账还没结，又是“朝日新闻社”的车送去的，所以很顺利的就住进去了。

但是，没两天，日军司令部一道命令：“玛丽医院接受军管。”于是，一切病人撤出，有的和法国医院合并，萧红又被迁至法国医院。

法国医院的大夫非常好，端木问大夫：

“萧红的病还有希望好吗？”

大夫：“假如在正常情况下，病人是有希望的，但在这种战乱情况下就不好说了，能维持现状就不错。”

这期间，日本记者小椋也到医院来看过端木与萧

红。端木抱怨都是养和医院开刀开坏了，否则不会这样严重。

小椋说“: 不开刀,萧红女士也活不长了,这都是战争的罪恶。”

端木随时用皮管为萧红吸痰，喂她水和牛奶，萧红痴痴地望着他。在没有人的时候，要端木用手搂着她，用气喃喃地说：

“我对不起你,是我拖累了你,我们本来是可以和他们一起突围的，可因为我，你也没走成……”

没有两天，这家法国医院又被军管，萧红只有和医院搬至圣士提反女校，一所临时医疗站，没有医药，没有任何医疗条件。萧红喉头的痰更多了，端木几乎不停地为她吸痰。否则就会窒息了。

这一夜，萧红有些昏迷，屎尿都不会喊端木了。

第二天清晨，端木为她倒便盆回来，忽然觉得萧红比夜里好了，清醒了，她要端木拿纸笔来，在纸上写：“我活不长了，我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现在我死了，你要把我埋在大海边，我要面向大海，要用白毯子包着我……”端木强忍着泪水安慰她说：

“你不会死的，等你病好了，我们一起回内地去，我们还有好多东西要写呢……”

萧红“: 你看,咱们是不是把《呼兰河传》的版税送给骆宾基，也算是给他的报酬。版权不能给他，版

权是咱们自己的。”

端木说好。

这时萧红又出现涌痰现象，端木急忙用吸管吸出。萧红爱怜地问端木：

“你是怎么吸出来的？”说完，微笑了一下头就歪过去了……

1942 年 1 月 22 日上午，萧红再未睁开眼的去了，永远的去了……

端木看着吸痰管，痴痴地看着萧红苍白安静的脸，脑内一片空白。

半晌，不知是谁，来抽出端木手上的吸痰管，他才看见了骆宾基。即要骆宾基去找照相的来为萧红拍遗容。骆宾基答应着走后，端木将萧红遗体摆正，将头发整整平，忍不住在她嘴上长长亲了一个吻，感觉到她余温犹存。

这时照相的来拍了遗容后，端木随着护士将萧红送进了太平间，当护士关上太平间的门时，端木再也忍不住，像孩子一样扑在门上大哭了起来……

天快黑了，端木心力交瘁，独自一人走到香港大学文学系主任马季明家中。马季明充满同情地留他在他家住下。

当时香港死人很多，每天都有专门收尸的人，开着车辆到医院运存放在停尸房的尸体，送去埋葬。无人认领的，不分男女，不穿衣服，统统埋葬在一个大

坑里。

端木为了实现萧红的遗愿，一早就来到停尸房的门口，看到来收尸的人中，有一位象是主管，因此，走过去找他，说明自己和萧红的身份和关系，请求他给予帮助。

这个人很好，知道死者是萧红，是端木蕻良的妻子，他在报上看过他们的作品，所以豪不犹豫地答应将萧红和其他尸体分开，单独安放在一个车厢里，并且从医院里取来白毯子将萧红裹上，送到日本火殓场火化。同时告诉端木去找日本军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死亡证、火葬证、和认领尸体允许单独安葬等手续。

在送萧红遗体去火化的过程中，端木看到萧红露在毯子外面的头发，他几乎没用大脑地取出挂在钥匙链上的小剪子，剪了一小撮萧红的头发，放在他西服里面的小口袋里。他天真地感到萧红没有完全离他而去……

火化后得过两天才能去领骨灰。这时间，端木跑到日本军政府有关部门，用英语和那位又高又大的日本人说我妻子死了，她是位文学家，她的遗言是要将她葬在海边，面向大海，请允许他实现妻子的遗愿。

那日本人因为听端木说的是英语，态度很好地问端木，准备葬在哪里？

端木告诉他，妻子生前很喜欢在浅水湾散步，希望将她葬在那里。

看来那日本人也不知道浅水湾在哪里，当时就批了许葬证交给端木。

端木从那里出来，就想到去买骨灰瓶，他敲开了家古玩店。端木是爱好古董的，一进去就看中了一对挂釉的陶罐，价钱也没还的就捧了回来。因为他想到浅水湾不是埋人的地方，战争结束后还不知会遭遇到什么命运。因此，决定将骨灰分装在两个罐里，埋在两个地方。这样总可以保存一份，将来带回内地，葬在鲁迅先生墓旁。

过了两天，端木去火化场领取萧红骨灰，路上还遭到“烂仔”的抢劫。

第二天，端木抱着一个骨灰瓶，带着毛笔和墨汁，要骆宾基和他一起走到浅水湾，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端木找到一个用砖砌起来的花坛，用手和瓦块在中间刨了一个坑，将里面的土挖出来。好在花坛中间的土不那么坚硬，终于挖出了一个深坑，将骨灰瓶正正地放了进去，填上土后，环顾四周，不远处，在被炮火打坏了的更衣室旁，拣了一块木板，端木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大字：“萧红之墓”立在墓前，用土和石块压得牢牢的。

这时天已快黑了，端木默默地在萧红墓前立了一会儿，轻轻地说：“你安息吧，萧红，总有一天会接你回去的。”说罢，深深一鞠躬，含着泪，便和骆宾基往回走了。骆宾基回时代书店，端木回马季明家。

马季明家经常有学生出入，也有个别住在他家的，对端木都相当好。

当夜，端木用白毛巾包着另一个骨灰瓶，约了一个学生和他一起出来，想找一个安全、不易被人发觉的地方埋葬。

端木想起圣士提反女校离这儿不远，萧红就在这儿去世的，香港再怎么变迁，这个学校总是会存在的，因此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挑选了面向东北方向坡上的一棵小树下，挖坑埋葬萧红另一半骨灰。

那位同学在校园里找到一把铁锹，便帮端木挖了起来，那时校园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淡淡的月光照着他们。端木和那同学轮流地挖，终于挖出了一个深坑。

端木将骨灰瓶仔细擦试干净，轻轻地放了进去，先用手往里撒土、压紧，然后再用锹往里填土，当那位学生为了将土压紧，在上面又踩又蹦的时候，端木几乎吼了起来。这是萧红骨灰呀！但随即就清醒过来：如不压紧，尽量作到不显眼，又如何能保住呢？

待一切就绪，端木靠在树上喘息了一阵，又对着萧红的坟地深深地一鞠躬，那位学生也随端木鞠躬后，两人就默默地往回走了。

到了马季明家，端木深深感谢这位同学，这位学生也感动地握着端木的手，要端木赶快休息，不要太悲伤了。

端木回到卧室，什么也顾不上地躺到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不一会儿，感到脚底剧烈的疼痛，不得不起来脱鞋查看，原来一双新皮鞋的鞋底已经磨穿，脚底板都流血了……

月底，端木给许广平先生写信，告诉她萧红逝世，骨灰埋在浅水湾，请许先生给内山完造写信设法对骨灰进行保护。

附录一：萧红、端木蕻良在香港给华岗*的信

西园先生：

你多久没有来信了，你到别的地方去了吗？或者你身体不大好！甚念。

我来到香港还是第一次写信给你，在这几个月中，你都写了些什么了？你一向住到乡下就没有回来？到底是隔得太远了，不然我会到大田湾去看你一次的。

我们虽然住在香港，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住在外边，尤其是我，好像是离不开自己的国土的，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所好的是文章倒底写出来了，只为了写文章还打算再住一个期间。端木和我各写了一长篇，都交生活出版去了。端木现在写论鲁迅，今年八月三日为鲁迅先生六十生辰，他在做文纪念，我也打算做一文章的，题日尚未定，不知关于这纪念日你要做文章否？若有，请寄文艺阵地，上海方面要扩大纪念，很欢迎大家多把放在心里的理论和感情发挥出来。我想这也是对的，我们中国人，是真正的纯粹的东方情感，不大好的；"有话放在心里，何必说呢"；"有痛苦，不

要哭，有快乐不要笑”，比方两个朋友五六年不见了，本来一见之下，很难过，又很高兴，是应该立刻就站起来，互相热烈的握手。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不然的，故意压制着，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装做莫测高深的样子，好像他这朋友不但不表现五年不见，看来根本就像没有离开过一样。你说我说得对不对？我可真是借机发挥了议论了。

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端木甚好。下次再谈吧！希望你来信。

沈山婴大概在地上跑着玩了吧？沈先生，沈夫人一并都好。

（重庆这样轰炸,也许沈家搬了家了,这信我寄交通部）

萧　红

五月二十四日

注 * ：华岗字西园，为《新华日报》前主编。当时正在重庆乡下养病，编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园兄：

七月一日信，六日收到。

民族史至今尚未印出，听说上海纸贵，出版商都在观望，等便宜时才买纸来印。可不知何时纸才便宜。

正如兄所说，香港亦非安居之地。近些天正打算上路，昆明不好走，广州湾不好走，大概要去沪转宁波回内地。不知沪上风云如何，正在考虑。离港时必函奉告，勿念。

但是这话说出来，对人家是否有好处呢？绝对的没有，而且有害的。中国人就是这样随便说话，不管这话轻重，说出来是否有害于人。假若因此害了人，他不负责任，他说他是随便说说呀！中国人这种随便，这种自由自在的随便，是损人而不利己的，我以为是不大好的，专此敬祝

健康

萧

七月七日

并附两信，烦一齐转文艺协会

九龙邮箱一六三〇　乐道八号二楼

园兄：

七月一日来示奉悉,快慰可知,该书尚未排出,出版商意存观望，也只好由之，等等再说。来香港已半年，总算度过去了，老友可为之松一口气乎，且已各成一书，皆给生活出版去了。幸哉幸哉。

这几天风云大紧,人心慌慌,弟等并不愿从俗,颇为镇定。但以为以与香港共存亡之精神处之，亦大不必。兄谓斟酌情况，预为准备，弟有同感。

弟本欲去，但以此路已断，随觉桂林亦佳，因彼处有宋云彬，艾芜等友，惟须经沪转甬才能去，故尚不能定。兄收到此信，即来信，弟仍可收到，请勿用报馆信封。

弟来港后，此公曾向许先生进言，沪上有人告我，尔仅未在彼所主之刊物投稿，便要陷人至此，世事真有令人大惑不能解者，呜呼！

弟如离港，当专函奉告，请即回信，以免愚念。

即颂

近安

弟　端

七月九日

园兄：

七月二十日来信，前两天收到，所附之信皆为转去，甚感。香港似又可住一时了。您的关切，我们都一一考虑了。远在万里之外，故人仍为故人计，是铭心感切的。

民族史一事，我已函托上海某书店之一熟人代为考查去了，此书不但您想见到，我也想很快的看到。不久当有回信来，到时当再奉告。

关于胡之乱语，他自己不去撤消，似乎别人去谏一点意，他也要不以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糊涂人，不是糊涂人说出来的话，还会不正确的吗？他自己一定是以为很正确。假若有人去解释，我怕连那去解释的人也要受到他心灵上的反感，那还是随他去吧！

想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侮陷，那时是还活着的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的同伙了，呜呼哀哉！

世界是可怕的，但是以前还没有切身经历过，也不过从周先生的文章上看过，现在却明了，是实实在在来到自己的身上了。当我晓得了这事时，我坐立不安的度过了两个钟头，那心情是很痛苦的。过后一想，才觉得可笑，未免太小孩子气了，开初而是因为我不能相信、纳闷、奇怪，想不明白。这样说似乎是后来

想明白了的样子，可也并没有想明白，因为我也不想这些了。若是越想越不可解，岂不想出毛病来了吗？你想要替我解释，我是衷心的感激，但没必要了。

今天我是发了一天牢骚，好像不是在写信，而是像对面坐着在讲话的样子。不讲这套了。再说这八月份的工作计划，在这一月中，我打算写完一长篇小说，内容是写我的一个同学，因为追求生命，而把恋爱牺牲了，那对方的男友，本也是革命者，就因为彼此都对革命起着过高的热情的浪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那悲剧在一开头就已经注定的了。但是一看起来他们在精神上是无时不在幸福之中。但是那种幸福就像薄纱一样，轻轻的就被风吹走了。结果是一个东，一个西，不通音信，男婚女嫁。在那默默的一年一月的时间中，有的时候，某一方面听到了传闻那哀感是仍会升起来的，不过不算具体吧了，就像听到了海上难船的呼救似的，遥远，空阔，似有似无。同时那种惊惧的感情，我要把他写出来。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块砖头的话，那么这块砖头再过十年去翻动他，那滋味就绝不相同于去翻动一块放在墙角的砖头。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次您在饺子馆讲的那故事来了。您说奇怪不奇怪？专此敬祝。
安好。

萧

七月十八日

附上所写稿‘ 马伯乐 ’长篇小说的最前的一章,请读一读，看看马伯乐这人是否可笑！因有副稿，读后，请转中苏文化交曹靖华先生。

又及

华兄：

民族史出版了，为你道贺。

你十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只等上海你的书寄来，好再作复信，不知为何，等了又等，至今未到。我已写信去再问去了，并请那人直接寄你一本。因近来香港不收寄到重庆去的包裹和书籍，就是我前些日子，所寄的马伯乐的一稿你也不能收到，因为那稿我竟贴了邮票就丢进信箱里去的。

现在又得那书出版的广告，一并寄上，因为背面有鲁迅纪念生辰的文章，所以，不剪下来，一并寄上看看，在乡间大概甚为寂寞的。

你十三日的信，我看了，而且理解了，是实在的，真是那种情形，可不知道哪一天会好，新贵，我看还没怎样的贵，也许真贵了就好了。前些日子的那些牢骚，看了你的信也就更消尽了，勿念。

正在写文章，写得比较快，等你下一封信来，怕是就写完了，不在一地，不能够拿到桌子共看。真是扫兴，你这一年来身体好否？为何来信不提？现在又写什么了？专此匆匆不尽。

祝好

萧上

八月二十八日

信未发又来了上海的信，顺便也寄上看一看吧，哪年能看到书真是天晓得，寄我的那本，我至今未收到，已经二十天了，等我再去信问吧。

又及

岗兄：

你的书我细心的看过了，你这书写得很好，我应该向你致贺，因为你的观点非常正确，我也几次想写一些读后感之类，但是因为①常常被绑票，写应景文章②参考书手边也不齐全。但迟早也要写出的。香港文化水准很低，这样的书，有力气来作评的人，还很少，要是看见的话，当然要剪寄给你。我的论阿Q本来预备登出剪寄你一份，以资讨论，但因删去很多，又由编者大斧一抡，就此完蛋，幸而早有一分复写寄许先生处，等她那分印出（周先生六十生辰纪念册中）我再寄你。但不知何年何月。

有青年问我可读书目，我便把你的书和铁流告他。

我自己除了身体不太好之外，还想写长篇。大概一九四一又是个笔杆年。

第三部写出没有呢？念念。急就成章也还是写出的好，这年头儿，十全十美的事不要想了，写出便算没白活，不然也要带到坟墓去。

祝

好

红这次不写信了，祝你好。

红上　弟端

十二月六日

园兄：

好久没给您信了。前次端兄有一信给您，内中并托您转一信，不知可收到没有？

我那稿子是没有用的了，看过就请撕毁好了，因为不久即有书出版的。

民族史，第二部正在读，想重庆未必有也。

香港旧年很热闹，想去年此时，刚来不久，现已一年了，不知何时可回重庆，在外久居，未免的就要思念家园。香港天气正好，出外野游的人渐渐的多了。不知重庆大雾还依旧否？专此，祝

好

萧

一月二十九日

园兄：

最近之来信收到。因近来搬出，所以迟复了。寄书事，必要寄的，就是不寄，也要托人带去，日内定要照办，因自己的文章，若不能先睹，则不舒服也。

香江并不似重庆那么大的雾，所以气候很好，又加住此渐久，一切熟悉，若兄亦能来此旅行，畅谈，甚有趣也。

端兄所编之刊物，余从旁观之，四月一日定要出版，兄如有稿可寄下，因虽为文艺刊物，但有理论那一部门。而且你的文章又写得太好了，就是专设一部门为刊你的文章也是应该的。第二部我在读，写的实在好。中国无有第二人也，专此祝好

萧上

二月十四日

岗兄：

得来书，大喜逾望，惟以搬家，迟覆两天，请谅。我们搬到九龙乐道八号二楼，来信请即寄此处。你的第二册已出来，我的案上就有一本，但是因为邮费太贵，得十七元港币，所以就没寄。最近因为相煎何急之事，据说航空也不能寄了。

有朋友说他可以想办法，托朋友带，我想恐怕也未必呢？但试试运气吧。要是可能再好没有。同时红兄出了一部《马伯乐》也一道带给你。看看开心。

我现在给香港时代书局编一个文学月刊，定名为“时代文学”,决定四月一日出版。里面虽都是文学，但社会问题，哲学问题也愿涉及，所以希望你写一篇稿子，（长期加入写稿，萧注。）你想多有意思呢。他妈的，自己家的刊物，登自己家的文章，亦一乐也。如你把社会史第一章给我最好。要能每章有一个题目，我想很可连载下去。但看你身体如何了。我想你不必勉强，有了就寄我，我就发，没有便休息。只要文章上告个段落就行。这样拿完发表费再出版，比先出版上算，因为他给港币，千字两元。合国币十元还要多呢。何筅而不为哉！此时代书店非大时代书局，社会史看样子大时代不能要。但因为他们忙着运货，没有工夫印书。现在恰巧咱们出刊物，就把它刊载起来，而

后慢慢找地方，因不急于找，反而能找好地方，弟等当为留心，勿念。

望来信　祝好

弟端木　三月

附录二：钟耀群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端木蕻良卷》写的编后话

钟耀群

香港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要列入端木蕻良一本选集，告诉我至少也有二年多了。端木蕻良自己的作品，过去很少保存，也没想过为编集子去收集。从三十年代开始写作以来，到底写了多少作品，他不甚清楚。现在要收集他的作品，并要我编他的创作年表，就未免费劲了。特别经过八年抗战、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动乱，资料散失不少，这一工作的难度就更大了，加上端木年老，多病，善忘，收集来的文稿，明明有他自己的署名，要他过目时，也得回忆半天，才能想起来当时是为什么而写的。更困难的是，他那些用化名写的文章，自己提不出什么线索，搜集极为困难。我不得不通过种种途径，把可能刊载他文章的报刊借回家，让他过目、甄别、判断。有些借不回来，不能让他亲自过目，就连知也不知道了。

我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调到北京市文联，专为协助他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对搜集他其他文稿

方面的事，也没有考虑过。直到香港刘以鬯先生来信，其中附了几页端木的创作年表，有几年是空白的，征询端木是否能提供一些篇目，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才开始写信，请求各地友好，到图书馆查阅他的作品。他们陆续抄写，复印，照相寄来。

许多热心的亲友，提供了不少资料和线索。最早、最详细的端木创作年表（约二百条左右），是那时还没有见过面的河南师范大学周启祥先生编写的。他写的年表分成三部分，即：著译年表，著作及选集编目，创作简编与研究他打印了数份寄来征求作者意见，并要求补充。当时，我即将手头所有，作了补充寄出，并转赠各地研究端木作品来要资料的朋友们。去年，又收到《北美日报》李怀敏先生寄来他在海外收集的端木五十年作品年表。在这些年表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补充订正，才形成目前编进这个集子里的年表。

根据目前收集到的目录和文章，端木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八〇年半个世纪，发表的作品共有五百余篇。这个集子，主要选了他早期的九篇短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的一至五章，和十篇散文。并按这套丛书体例的要求，选进了早期和近期评论他、介绍他的文章各一篇。对他的生平，在年表中也作了一点简要的叙述，供愿意了解他，研究他的读者们作些参考。

经过较长时期为端木收集文稿，看到一些以前未

看过的作品，但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细看。出版社要我对他的创作生活等方面作些介绍。这对我来说，是有些困难，只能就我所知，拉杂谈一些看法罢了。

我感到他的创作，也和别的作家一样，是根植于生活的，但有他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端木常说:“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时介绍世界文学到国内来的人，是有抉择的，是把文学作为可以改造我国“国民性”的有效手段来看待的。当然也存在一些认识不清的问题，但意图是分明的，态度是严肃的。把写作规定为“创作”，就是这一事业最好的注释。

从那时以来，就有“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同观点。端木很早就服膺前者。这个信念，驱使他乐于接近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普希金等这些大家的作品。由于同样原因，他对鲁迅先生，从理智和感情上都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他认为鲁迅先生是最有民族气魄的，对外国文艺，又是最有鉴别能力的吸收者。

端木是学历史的，他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对过去流行的一句话：“唐诗晋字汉文章的评价，一直没有异议。这表明他倾向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艺术。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光辉的时代，一个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兼收兼蓄的唐代。这两个时代，都不排斥外来的影响，或者说民

族间相互的影响，从而在文化领域中进行正常的交流，以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

端木很注意继承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他对过去的长篇古典小说，最推崇《红楼梦》，对短篇，最推崇《聊斋志异》。对后者运用的语言的灵活，很钦佩，但对作者未能用白话写出，则表示惋惜。他经过长期的比较研究，仍未改变这种观点。

端木是早熟的，他了解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个大时代。火烧赵家楼是在一九一九年，他第一次到天津读书是一九二二年。当时的文化中心在北方，特别是在平、津。所以，他接触新文化比较早，吸收力也比较强。他小时候听到哥哥读诗，就能记住，自学《古文观止》等名篇，都可成诵。后来回到家中自学，父亲的藏书，他也胡翻乱看，从大部头的《说郛》，到小部头的《谐铎》,上海的《游戏杂志》,以及《黑奴吁天录》、《侠隐记》、《十五小豪杰》等等都翻阅过,兴趣是多方面的，求知欲达到贪婪的地步。而他的性格，却是偏于孤僻清高的，这也就使他能留下更多时间去读书。

生长他的野性的摇篮，那荒凉广阔的科尔沁旗大草原，赋予他一种浓郁的浪漫气息。

科尔沁旗大草原的魅力，早就攫取了他幼小的心灵。他热爱自然，对自然充满了感情。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接连爆发出失去土地的农民

同占有土地的地主之间的斗争；现代中国，又有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血战。端木少年时代目睹了围绕土地进行的斗争生活；青年时代又经历了失去家乡故土，进而面临亡国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无论是反封建，还是抗日的，都情不自禁紧紧围绕土地来创作。他曾说过:“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壤的历史而来的。”大野的雄风孕育着他,他也为大地母亲画像。

端木在家庭中是最小的儿子，母亲常对他倾吐自己可悲的身世，希望小儿子长大能把她的身世写出来。端木一直记住这句话。但在他能写作时，已经不止是为母亲写作，而懂得为千百万人来写作了。在端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发表较早的一篇小说《母亲》,再现了他那曾是贫农女儿的母亲,和那曾是地主少爷的父亲一段用暴力构成的往事，真实地记下了当时东北草原上阴暗生活的一面。

承友人找到了端木一九三二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母亲》,把它和现行本《科尔泌旗草原》对照来看，就可以看出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科尔泌旗草原》了。《母亲》是他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片断。待到一九三三年，他就把科尔泌旗草原‘直立起来了’(巴人语)。郑振铎先生看完端木寄给他的这部长篇小说时，曾断言“必可震惊一世人的耳目”。第一个发现端木使用的是真正大众化语

言的人，也正是郑振铎先生。不过，他自己并不满足这些，认为这只是一个开端。他在初版《后记》里所说的一些话，也表明了他是以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来进行观察和反映社会的。

关于这部作品的评价，已经不少，但我还想说几句。《科尔沁旗草原》中无疑有他家族的影子，当然不是那么扣实的，因为作者的意图，是想囊括整个大草原，并用解剖刀来对它进行分解。作品中塑造了四代人，有很强的时代感，每个主人公又都有各自的性格。作品还通过描写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反映出这片土地逐步走向殖民地化的过程。

再就是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两首诗，也须在这儿提一下。一首“ 春月春花春满楼 ”的旧体诗，颇近于《春江花月夜》的情调，不难看出，是受了《红楼梦》中“ 风雨词 ”的影响。另一首新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 但他没有蔼尔思倍思，
> 他也不憧憬那白房子，
> 除非是那么样的时候，
> 他走进了那么样一个大红房子。

这是他读了瑞士海尔曼 • 苏德曼写的《忧愁夫人》后写的。这时的涵义已经越过《 忧愁夫人》本身，它寄托了端木的理想，这理想在书中所刻画的人物身上表现了出来。原版的《科尔沁旗草原》末尾，曾有一句

拉丁文“VITA NOVA！”这是一位农民起义英雄潘查·维拉提出的口号：“自由万岁！”端木在大山出现在义勇军进城的火把海龙里面时，用烘托的笔法，移植到了大山身上。

从以上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作者一些艺术思想根源来。有位日本女评论家分析，《科尔沁旗草原》在受了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影响的同时，又具备了阶级观点。

这个集子里，收进了《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的开头几章，也是为了提供愿意研究他作品的读者们一些儿材料。

短篇小说《红夜》和《雕鹗堡》,写了封建愚昧的沉重生活，如何使人们对周围环境，形成了怪异的看法。在《红夜》中，人们可以用赞美的口吻去叙述想象中的姑娘和石人结婚，毫不怀疑地赞为“圣洁”，而对现实中正常的青年男女恋爱，却被认为亵渎了神明，是不可饶恕的犯罪，传说中的悲剧成了喜剧，现实中的喜剧却成了悲剧。

《红夜》是把传说和现实编织在一起的小说,运用了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一步紧似一步，引着读者随着作者的安排，走进故事中的石洞里去的。小说一开始，就写道：

“这村镇,荒凉,奇异,而且充满着唉叹,有更多的色彩和故事。”

接着,便从婆婆口中，讲出了一个和俄罗斯民间传说，唐 诃 的 故 事 样成 人的故事，随即，写出了玛璇姑娘和龙哥爱情的遭遇。

旧时代已经和石人被风化的同时，把人的心灵也风化了，用神权和辖制权来把人束缚住。神的意志，是由神巫来传达的；辖制者的意志，是由“汉爷”来传达的。凡是违反了他们的意志的事物，不管多么美好，也会看成是邪恶。

端木有一种习惯，他不管走到哪儿，都想方设法去了解那里的民俗风情，多少次在旅途上，他不顾已经安排好了的时间，已经买好了的车票，执着地去做这方面的调查。所以，哪怕是面对香港，上海这些大城市，在他笔下，也会出现一种风土画、浮世绘来。

他喜欢白描，在他最初学画时，就对《曹衣出水》和《吴带飘风》两种对立的画法，放在秤盘上，得出同等的重量。

四十年代初，他在桂林时，通过朱琴可，阳太阳，李文钊，陈迩冬诸位朋友，对桂林的风土人情，做了深入调查。有一次，阳太阳约他去看巫舞，他就记下了《天府榜文》、《地府榜文》,及巫师们在桌上供奉的一百零八个神像。

据他告诉我，他对广西的“石棺悬空葬”很感兴趣，但一直没有看到有人予以研究，感到十分惋惜。同时，他对广西供奉石臼石杵，巫师们用它们来为病人

解殃治病的事，还想写出专论来。他在桂林郊区看到巫师用羊角卜卦，就认为这是古代卜术的遗留，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把上述这些与他在《科尔沁旗草原》、《大江》中写的《跳大神》的场景联系起来，注可以看出他对风土民俗的重视了。

《雕鹗堡》这个短篇小说，在反映封建社会令人窒息的生活的同时，也写出了具有青春活力的青年形象。他们对旧生活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环境迫使石龙要作出“越轨”行为，向人们心目中的神灵挑战，去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风水”。他的勇敢，赢得了姑娘的爱。但石龙失败了，身死了，姑娘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嘲讽。石龙和代代的故事，虽然在山歌里被歪曲地传唱着，然而，那追求光明美好生活的行为，和真挚的感情，却感召着像石龙和代代一样的青年男女，悲歌终会被谱成欢快的曲调。

《红灯》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不是纯文艺性质的刊物上，所以，很少为人所知，这回通过一系列线索，终于在北大图书馆找到。

这篇小说不长，但概括的方面较宽阔，主要写的是敌占区老渔民复杂的内心状态。

老渔夫爷爷病得不能动了，外面响起了风暴，他想到“：海真够馋了,吃了多少孩子的灵魂,还不够啊，要是有一天把海水淘干了，堆在里面的白骨头，一定

要像石灰窑似的……”作者用这几句话，概括了渔民多少代人的命运。

老爷爷一家没有一个劳动力，他们的儿子不是淹在大海里，就是被敌人掠去当苦力了。爷爷、婆婆带着孙女儿在风里雨里，在汉奸、无赖的包围中，在死亡线上作最后的挣扎。

但是，爷爷听见海上又翻了船，岩石上没有人亮灯，便拚着最后一口气，终于使一盏红灯，又在岩石上面亮了起来！这时，爷爷的生命也许熄灭了，但红灯会使渔船的舵，转到岸边的方向……

《朱刀子》这篇小说发表时,正是金圆券发行、泛滥的时候，刊物的发行网却被冲没了，因此，读到它的人，也许不会多。读者的注意力，也许会侧重在它的情节发展和创作手法上。但是，我想把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另一个角度，说上几句。

在这个短篇里，作者通过手艺人的生活，反映了关东草原地主的原始剥削手段，这个“幽灵”在主宰着这篇小说，成了小说中看不见的主角。

对于经济情况也是端木最着力观察、分析的。《科尔沁旗草原》中关于东北粮栈，烧锅，油房的描写，就已见端倪。他在读大学时，古典经济学是必修课（由哈佛大学回来的萧蘧教授讲课）。那时，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已感到极大的兴趣，甚至借了英文版《资本论》来啃。虽然并未完全弄懂，但对他的创作还是起

到了一定影响。

《门房》这篇小说,有过这么一段来源。端木在南开中学时，作过一任《南开义塾》校长。待他到上海发表文章后，有个学生叫孙士斌的，发现端木蕻良就是他原来在南开义塾读书的校长曹京平，便写信给端木，要端木帮助他写作。有一次他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作门房的生活。端木看了，觉得这封信不但真实的记载了门房的生活，文字也还过得去，便稍稍加工后，寄给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有一次回信中说附有稿子一篇，就是指这一篇。

一九四八年，他在上海时，就以这个青年的遭遇为题材，写了《门房》这篇小说。小说通过老“门房”对儿子的说教的描写，对“门房”哲学进行了深刻的讽刺。

在旧社会曾流行着“长随必读”这种传授奴才哲学和受法门的读物。类似这种书很多，确实可以与“女儿经”媲美。那时候，有个小党派的中心人物，自署别号为“肥豚”，死心塌地地宣扬这类哲学，为反动统治作门房掮客。对于这些，作者是很熟悉的。小说通过两代人的思想冲突，揭露了“门房”哲学。它在青年心中的投影是丑恶的，受到了青年一代的抵制。

这篇小说，表现了端木创作风格的又一个方面。

总的来讲，端木是按照写实主义的道路摸索前进的，追求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即使是在短篇

小说里，也不难看出，他的思想触角总是向着纵的横的方面延伸和扩展的。他总是不违背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地的现实情景，又能够冲决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这就有时也会采用一些“象征”的手法。如《雕鹗堡》中的雕鹗，《红夜》中的石洞，《吞蛇儿》中的蛇，《大江》中的大江,《大地的海》的题名…… ,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又升华出一种超出现实的效果来。

从沉积着千百年封建尘土的科尔泌旗大草原，来到当时的天津，北京，以后又到上海，武汉，重庆，香港，再返回内地……，端木的这些经历，以及他对城市生活的了解，促使他写了《嘴唇》，《可塑性的》，《三月夜曲》,《火腿》,《找房子》。《生活指数表》,《门房》，《新都花絮》等短、中篇小说。其实，他更喜欢倾力于大场面。这和他惯于探求，惯于思索，要求生活面比较广阔是分不开的。他曾经有过庞大的计划，要写几部长篇，如《大时代》，《上海潮》,《几号门牌》等。但都由于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长篇都只写了开头几章，就夭折了。当然，这又与他从不满足于既有成就，总是追求新的境界是分不开的。

他早期的代表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浑河的激流》，这里就不再说了。

端木的散文，似乎比他的小说更具特色。他的兴趣极为广泛。他在一九三〇年就写过《立体的人生》，主张人要全面发展。

他对颜色、声音有特殊的敏感。他对自然科学的热爱，绝不亚于社会科学。受德布尔的影响，他喜欢对动植物作细致的观察；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他关心最新的科学成果，“相对论”有了什么新的发展，达尔文主义补充了什么新内容，对“基因”的研究有什么新的突破，等等，都是他经常关注的问题。

端木从小求知欲就强，因而他的兴趣、知识是多样化的，而且是不断更新的。这在他散文里表现得较为突出。

这里收入的几篇散文，都是从未编过集子的。有几篇是表现他缅怀故人感情的。如《燃烧》，是纪念池田幸子的，她和萧红，端木在武汉、重庆时，有过难忘的友谊，这在《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中，也涉及到了。《追怀许地山先生》表现了端木对先辈的崇敬感情。

《黑尔格勒河》,是六十年代初,端木随同叶圣陶，老舍，曹禺，吕骥等北京一批文艺工作者参观访问内蒙后，写的二十余篇散文作品中的一篇，连同一九四六年他写的很短的散文《春草》，可以看到他抒情散文的又一个方面。

《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年》,是他为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文章，还有这个集子中唯一的旧诗七律二首《萧红逝世四十周年祭》，都是一九八二年的作品。我将这两篇有关萧红的作品编了进来，并想

说说。在这个选集中，为什么还选入他一九四一年发表在《时代文学》上的小短文《纸篓琐记》。

端木从小就养成和书交友，用笔谈话，行路也在思索的习惯，所以，孤僻必然降临到他身上。他很不愿意流露自己的感情，他觉得外露的感情是廉价的，只有深沉的感情，才是可贵的。正如他的文章，喜欢在行文中有股潜流。

也许由于孤僻，也许是由于内向，更确切地说，是由于不谙世故，他总愿意歌颂冷艳的感情。他认为埋藏在内心的火焰才是最炽热的，也是永不会熄灭的，即使被人窥见到的火苗，也应该是蓝色的。这对于我们去看待他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如灵子、水水、金枝姐、水芹子、代代……等人，都是适用的。他从不认为离开理智的感情，才是最深厚的；他认为从理智深处迸发出来的感情，才是不可动摇的。这对于我们去看待他的日常生活，也同样是适用的。

一九六〇年三月，端木和我在北京东城区办理结婚登记，在表格中"曾经结过婚没有"那一栏目里，他填"一九四二年丧偶"，并对我说："至今十八年了。"一九六一年秋，我到北京开会并探亲，在刚刚分配给他的两间楼房中，清理他杂乱无章的东西时，在一个小皮箱里，发现一个左上角印有《星岛日报》的旧信封，封面上写着"萧红遗发"四个字。我迟疑了一下。因为当时他去内蒙参观访问，作为他的妻子，没有经

他同意，就清理这一类纪念品，是否合适？但我还是怀着悼念和崇敬的心情，把信封打开了。看到里面一小缕不整齐、也不太柔软的头发。

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到那时，几十年的岁月，基本上是在流浪、动乱中生活的端木，物品散失殆尽，特别是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的今天，却奇迹般地珍藏着萧红的遗发，对他这种感情，我是珍视的。

他在《纸篓琐记》中，有这样几句话“……那时，票子很不好买，据说托人也得先一天定座。到城里去找朋友，我想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弄到手，要带的东西，足有余裕回学校整理。朋友晚上回来告诉我，十五号有一张，十七号有两张。十五号就是明天，又是一张，我当然不走，……”从这后面两句话的九个字中，我窥见了他的真挚感情。一九三八年端木、萧红在武汉，因为他托人只买到一张船票，他要萧红先走，萧红要他先走，争论时，萧红发了脾气，非要他先走不可！安娥在旁也说她能搞到船票，和萧红一起走会更方便一些。这样，他才不得不先走了。可以想象，当他和罗烽同一条船离开武汉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他能够重新执笔时，每到清明时节，他都有诗词祭奠萧红。有的被我发现，我曾寄给广州的黄力，请他在清明节代端木祭扫萧红墓时献上。当然还有更多没被我发现的，似乎还都埋藏

在他心底。“九曲寒泉难为冻，奔流到海报卿卿。”端木本人及作品中感情流露方式的一致性，在他一九八二年度的两篇作品和《纸篓琐记》里表现得最明显，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们选入本集的原因。

端木身体从小就不好，青年时期也得过肺病，五十年代后期，又得了高血压，再后又得了脑血栓轻度偏瘫，发展成冠心病。但他从未被压倒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从作品里，只看到时代的年轮，却看不出病理的痕迹。对一切他还不知道，不理解的事物，仍然执着地设法去探求，思索，表现……

在创作中，他反对‘掉书袋”，但有时也未免‘旁征博引”，描写有时也嫌枝蔓，有些词句过于冗长难懂，缺乏明快感。由于他的创作习惯，再长的长篇，也从不作提纲，因此，有头无尾的篇章，和没有写完的人物雏形就多了。如果天假他以年，而健康情况又允许的话，他会完成他的心愿的，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创作。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北京

附录三：萧红和她逝世后的一些情况

美籍华人学者　　沙洵泽　孙　凯

一九三四年，即东北沦陷后三年，萧红同萧军逃入关内，和其他东北流亡知识青年一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由于左翼革命文艺的影响和鲁迅的指导，她在 1935 年以后的作品中充分地表现了她那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她对革命前景的热切希望。

最近几年来，国内对萧红文学创作重新给了很高的评价，人们一致认为她是三十年代的一位比较有成就的杰出的中国女作家，国内外欣赏萧红作品的人们都认为她的文笔细腻，描述动人，真实地反映她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精神面貌，艺术地反映了北大荒的农村生活，哈尔滨的‘文明社会”,把富有生命力的广阔的松花江平原的和那些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的心声传播到祖国各地，震奋人心，鼓舞人们的抗战斗志。

三十年代东北作家在国内外比较出名的有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很多人都对萧红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在一九七三年夏季应邀参加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国际性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在会上我们以《乡土文学》为题做了一个关

于萧红、萧军与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作品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报告，当时因为中美关系好转，美国的中国文学学者们便扩大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过去他们只讲明清小说和三十年代的几个著名作家，一提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文艺就全部被说成是“抗战八股”，没有文学或学术价值。一九七三年哈佛主办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的一个结果就是改变了好多人对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看法和态度，给一些研究和爱读抗战时期的和全中国解放后的革命文学作品的人们开扩了眼界，打开了大门。过去诬蔑讽刺无产阶级文学的几个写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教授，这时也不再受欢迎了。他们有的改变了态度，有的采取观望态度，但是再没有人能够完全否定革命文学的价值了。

1942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斯诺先生和夫人曾向美国读者热情地介绍过二萧和他们的作品。他们都认为萧军和萧红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最优秀的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充沛地表达了中国老百姓的奋斗精神。抗战胜利以后因为种种国内和国外的因素很少人真正地客观地评论萧红和萧军，台湾出版的几本关于“三十年代文坛”的书籍多是冷讽热嘲，别有用意。现在除了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和他英译的《生死场》与《呼兰河传》合订本,李欧梵介绍萧军的文章以外，新出版的比较全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里都包括萧红和萧军的作品。

今年七月我们有幸由二萧的老友，黑龙江大学陈隄老师陪同去呼兰参观萧红的故居，得知政府已经拨款维修保护那座古老大瓦房做为纪念萧红的场所，如果萧红有灵她该含笑安息了。到了她出生和生活的地方，我们对她所出生的大地主家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然她的幼年是充满了苦难，没有富贵和荣华，但那里大自然的秀美和田野的芳香却是给予她无限的启示。我们对她那短短的一生，虽然看了许多关于她的生平资料，又和萧军和端木蕻良谈了话，更有几位研究过萧红的专家给我们作过解释，但我们仍然是有许多不解的问题。葛浩文曾说过关于萧红最大的迷是围绕她逝世的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1979 年我们在解放后首次回国时曾与端木谈过，那年返美经过香港时曾做过仔细调查，从朋友手中得到一部分关于萧红逝世和迁葬的官方资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政府承认端木蕻良是萧红的合法丈夫。端木本人也曾向我们说过和萧红正式结婚，他向我们详细地述说了从萧红 1941 年末病重到她于 1942 年 1 月 22 日逝世那段时间的苦痛艰难生活。为了治病筹款，他跑遍香港九龙，因为自己不能经常亲身照顾而把病妻托给同乡友人，无论萧红临终前说什么后悔或瞒怨的话，在那种兵慌马乱，炮火连天的情况下，端木是尽可能地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萧红死后，端木费了很大的心血才能找到一个比

较安全肃静的地方埋葬萧红遗骨的一部分。据调查亲殓萧红的是香港马超楝先生，他曾写过一篇《殓萧红》的文章，发表在 1949 年的《周末报》,在 1942 年马先生任日本占领的香港政府卫生督察，负责处理港岛区的尸体收集和埋殓等事务。日军占领香港初期，对市民采取镇压的政策，再加上粮食奇缺，所以被杀死饿死的中国人民是很多的。 1942 年 1 月末，马先生按常规带领工人和车辆到柏道医院（即圣士提反女校校址），搬运存放在殓房的尸体，准备埋葬。据马先生说那时他遇见一位有北方口音的中国人，他叫端木蕻良，是死者萧红女士的丈夫，要求马先生协助安葬亡妻。端木本身带二百元现款准备做为殓葬费，但在赴院中途，他身上所有的钱被人劫掠。这件事端木没有向我们说过，不知是否属实。当时因为使用墓地有限制，如死亡者无人认领，日本控制下的政府即派人将尸体倾倒在西营盘高街陶淑运动场埋葬。可是马先生是喜爱萧红著作的读者，也很同情那夭折的从塞北来到南国的年轻女作家，所以他破格予以优待，没有把萧红遗体放入乱尸堆里，经过马先生的指导，端木蕻良取得一位日本熟人的帮助，到日军政府办领死亡证，火葬证和认领遗体手续，所有被占领当局埋葬的尸体不穿衣服，尸体不分男女，全部搬上尸车运出埋葬，为了表示对萧红尊重，马先生取得医院毛毡来遮盖她的遗体，并另外将尸体放置车中的特别车厢里，

和其他尸体分隔，最后，他把萧红遗体移送到东区日本火[illegible]场火化（即今天的东区卫生局旧址，在东华东院附近）。火殓后两天的一个黄昏端木领回萧红骨灰，把一部分埋葬在那时候颇为荒凉而景色美丽的浅水湾(丽都餐厅山边)。

自1942 年 1 月起到 1955 年 5 月的十五个年头里，萧红的遗骨静静地埋藏在那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流交汇的香港浅水湾畔。人们在那寂寞的沙滩上凭吊萧红的坟墓,从此“人们便常常把这一代著名女作家的坟墓，与浅水湾的青山绿水相提并论”。（香港《文汇报》1957 年 5 月 7 日）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人建议把萧红的骨灰移出迁葬到祖国大陆去，但是也有人主张把她的浅水湾坟墓维修整理，留在香港不动。虽然浅水湾不是墓场，萧红安葬在浅水湾又没有香港政府的许可证，但是，萧红的墓却一直安静地保留在那里。战后十五年中浅水湾有了很大的变化，附近修建许多建筑物，商业机构也渐渐向浅水湾延伸，原来萧红的墓上有一块大石碑，碑上刻有“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坟墓的周围有一个水泥园圈儿护墙，墓旁有树木，墓上有时出现不知什么人放置的花圈儿。萧红死后的头十五年是很平静的，可以说是悠闲的,谁知在 1957 年她却在死后又经历了一场风暴，因为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萧红占有那一小块土地，又受到被人霸占的威胁。

1957 年 5 月 2 日萧红浅水湾墓开始被人拆除了，当消息传出后，香港中英文报纸都有反应。根据报纸消息，拆除萧红墓的主要原因是浅水湾丽都酒店（Li-do）准备在那里修建一个水池，给儿童们做为玩汽艇玩具的地方，坟墓上的建筑拆除工作完毕后，把原来的水泥园圈维修整齐，圈内又摆上一个可供儿童游玩的铁梯子。因为丽都酒店附近的海滩已变成游客游泳散步的风景区，在刚拆除的坟墓上，有人便开始做起小生意来，有卖冰糕的，有出租游泳衣的……。

当拆除萧红浅水湾墓的消息传出后，香港文化界一些人士都很关心，希望拆除工程暂时停一停，给他们一个机会以便考虑如何处理萧红墓的问题，是否把它迁葬到香港的一个墓地或是移葬到祖国内地。他们需要一些时间商讨研究完以后才能决定。最后，他们和国内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决定把萧红骨灰移葬在国内，由香港叶灵凤出名向香港市政府申请移葬许可。在 1957 年 7 月 19 日香港市政事务署发给迁移或检拾遗骸执照，号码是 51950。

国内主要负责移葬萧红骨灰的机构是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叶灵凤说端木蕻良以萧红丈夫的名义委托他办理的，于是他把在浅水湾海滨掘出的萧红骨灰存在香港红锄厝房，1957 年 8 月，萧红生前几位友好在红锄厝房方永别亭举行一个简单的辞别仪式，然后把骨灰盒交给中国旅行社由火车运往广州移葬。萧

红的骨灰在香港浅水湾存留十五年后终于归还她热爱的祖国大陆，她小说中的那支象征性的红旗今天飘扬在她的坟墓上，她被安葬在距家乡遥远的珠江之畔的银河公墓。我们想，如果她的遗骨被松花江的一个支流呼兰河水滋润着的时候，萧红的英灵是不是更会安静些，她是不是会更安心于“九泉之下”呢？

附录四：葛翠琳文《沉默》节选

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伴随着政治审查的思想整顿和清理，创研部总是重点。当时我在市文联办公室工作，担任老舍的秘书，联系文联各部门是日常工作。记得反胡风运动开始前，来了一位新领导，他认为端木目中无人，更认为端木领导的创研部“藏龙卧虎”，隐藏着重要的敌情，是妖魔鬼怪兴风掀浪之所，必须高举斩妖剑，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端木。

运动初期，那位领导多次找端木谈话，要他交待问题，端木总是沉默。后来那位领导以抗拒运动相逼，端木无可奈何地说：“经过痛苦的思考，我的认识有所改变。过去，我以为只有参加了反动组织才是反 革命。现在，我认识到即使和任何反动组织没有丝毫关系，也可以成为反革命，是从思想上审查。”

那位领导哼了一声，说：“你的认识么，有那么一点儿进步，算是态度开始端正。但是你谈的很空洞，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这是过不了关的。”

端木沉默，目光黯然。

那位领导又说：“很清楚，萧红就是胡风分子，你还能逃脱吗？”

这时，端木神态骤变，一张为痛苦扭曲了的脸孔，涨得通红，嘴唇颤动着，讲话像陶瓷的碎裂声，刺耳惊心：

“鞭尸是封建帝王的作法；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处置。但我决不许污蔑萧红！”

端木猛地站起身来，全身索索发抖。

那位领导连吼了两声：“你坐下！”

端木径直走出办公室，不管领导怎样吼叫，他也不回头。可见萧红在他心中的份量，他对萧红的感情有多么深。

后　　记

5 月 13 日上午，我带着端木骨灰和亲友来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门前会合。这是一座英国老牌女校，制校极严，当天里面正在进行会考，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学校老师梁政和马庄华按时出来热情地迎接我们到会议室入坐，介绍校方情况，梁老师特别说到校园内有一棵大树，每年上面都开着红艳艳的凤凰花朵，但几年前忽然倒塌了。并且拿出一本厚厚的精装校史送给我,翻到 40 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那一段，其中有萧红病故于该校的记载。我非常感谢地收下这部宝贵的校史。接着，领我们参观了日寇占领时，老师嬷嬷们准备逃跑的楼梯通道，还有日寇留下的柜子，上面还贴有当时日本年号的标签，校长苏国珍在监考之余，也到校园来接待我们。

校园内大树参天，花坛草地都很整洁，独独在那棵倒塌的大树树根周围，杂草丛生，等待料理。刘济昆先生建议我将端木骨灰撒在花坛上，但我径直向倒塌的大树根走去，我认准了这棵倒塌的大树，就是当年端木埋葬萧红骨灰时的那棵小树，半个多世纪，它应该长成大树了。每年开出红艳艳的花朵，不就是因

为埋葬了萧红的骨灰吗？几年前的倒塌，很可能就是当年挖坑埋骨灰时，碰动了这棵小树的根根所致……，我毫不犹豫地将装在红锦合内的端木骨灰，撒到了这棵倒塌的大树下……

从女校出来，卢玮銮教授指给我看她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学，就在右边不远的山坡上，使我不由想起当年端木深夜怀抱萧红骨灰，来到她去世的圣士提反女校校园来埋葬的心情。随后，我们来到浅水湾凭吊当年端木埋葬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地方，大海，沙滩，更衣房，花坛……我都不觉陌生。

回到城里，拜会了最早出书评论端木作品的著名作家、《香港文学》出版社社长刘 以鬯先生，向他汇报了上午顺利撒端木骨灰的情况；并告诉他，我写了《端木与萧红》,要为端木平反。以鬯先生毫不犹豫地留下复写稿子和附件，告诉我 7 月香港回归是压倒一切的主题，8 月份可以开始连载。我很感激。

14 日上午，林长青领我去九龙尖沙嘴乐道 8 号二楼，查访端木萧红居住过的地方。但是， 50 多年过去了，乐道地区已面目全非，8 号一带已改建成凯悦酒店了，我只能凭着想象抬头向空悼念。

接着，从乐道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端木带着病中萧红过海去香港的码头，也是什么痕迹都找不到了,向对岸看 [illegible] ，一座宏伟的建筑正在拔地而起，长青告诉我，那就是今年七一回归的大会堂。我立即要

长青为我拍下这个镜头，当年端木为萧红受尽苦难的地方，很快就要回到祖国怀抱了，他俩在天之灵，能在香港回归前夕会合在一起，共同迎接回归，也不枉他俩用笔为祖国、为人民战斗的一生。没有比这种机遇更好的纪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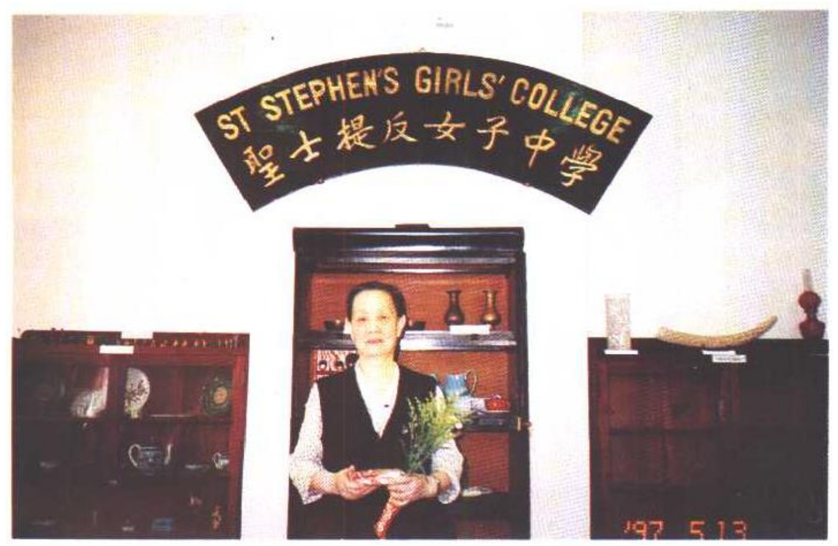
当晚，我乘国泰航班离开香港，当飞机从沿海跑道起飞到天空后，我看到大海中的港岛，确实是地球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真是太美了！现在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而端木与萧红却能在这颗璀璨的明珠中永生！

15 日上午，飞机准时到达澳大利亚悉尼，女儿钟蕻抱着端木生命延续的唯一亲骨肉小沁芳来接我，真正是悲喜交集！端木临终时，知道女儿曾不顾一切要放下初生的婴儿飞到爸爸身边，他立即要女儿带好孩子，千万不要回来……端木是对的，自然规律是那样的无情，又那样的有情；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的……

三个月后，我将带着钟蕻和小沁芳回到北京，继续完成端木未竟的事业。

感谢为这本书进行过帮助的亲友们！

钟耀群 1997 年 7 月于悉尼



作者像



②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右排丁玲。一九三八年摄于西安。左起：赛克、田间、





①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端木蕻良摄于西安。



③一九三八年聂绀弩、丁玲、端木蕻良、赛克、萧红、凯丰摄于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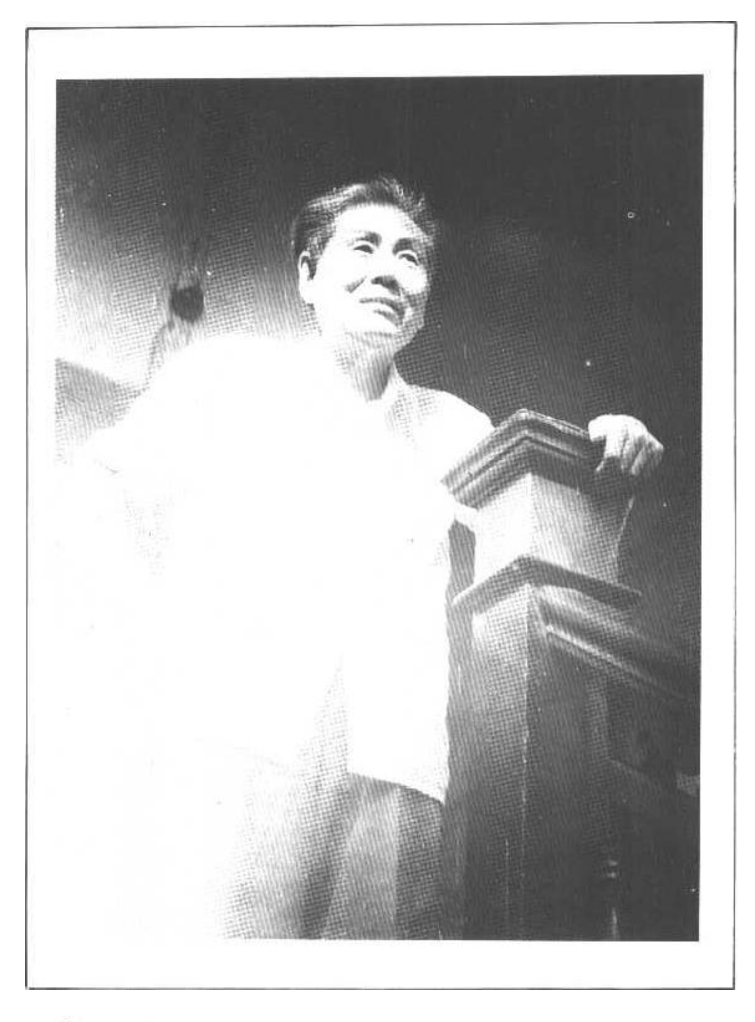
④一九三八年三月端木蕻良手执萧红赠的小棍摄于西安。



⑤一九三八年三月端木蕻良与萧红摄于西安。



⑥一九三八年三月端木蕻良与萧红摄于西安。



⑦ 一九八五年十月，端木蕻良在汉口寻找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和萧红结婚的大同酒家，登上二楼忆起当年的情景。

（钟耀群 摄）



⑧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参观萧红故居时，端木蕻良在萧红肖像前留影。 （钟耀群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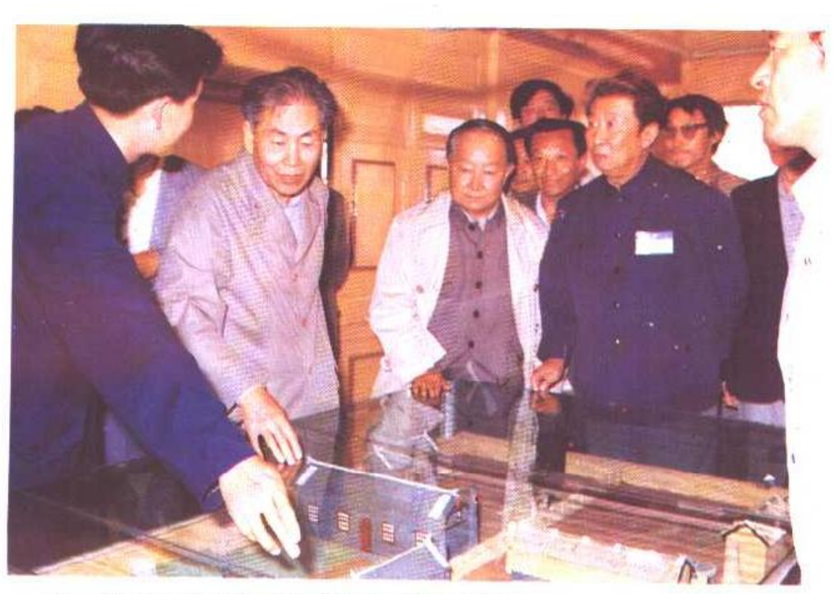


⑨ 端木蕻良见到萧红故居的萧红肖像，拄着手杖直奔过去。

（钟耀群 摄）



⑩ 端木蕻良为萧红故居题字。 （钟耀群 摄）



⑪ 端木蕻良询问萧红故居的模型情况。 （钟耀群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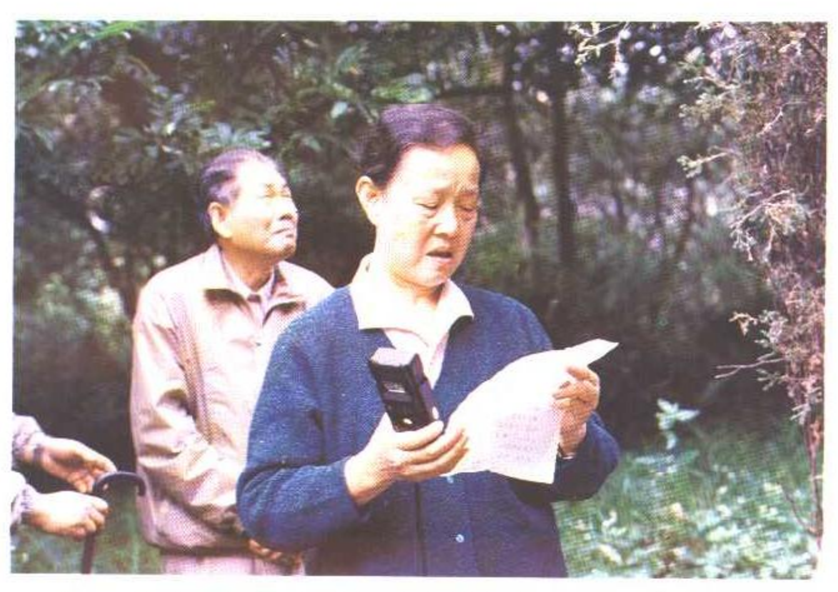
⑫端木蕻良坐在萧红出生的炕上留影（钟耀群 摄）

⑬ 端木蕻良像孩子一样躺在萧红出生的炕上。（钟耀群 摄）

⑭端木蕻良参观萧红故居出来时与看门老人合影。（钟耀群 摄）



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端木蕻良和夫人钟耀群于广州银河公墓祭扫萧红墓时留影。 （黄辛 摄）



⑯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钟耀群在萧红墓前朗读端木蕻良祭萧红的诗《风入松》。 （黄辛 摄）



⑰ 钟耀群近照。



⑱ 香港圣士提反女校校史上记载着一九四二年一月萧红病故于该校。（卢玮銮 摄）



⑲ 圣士提反女校中国文学与历史科教师梁政介绍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时的情况。（卢玮銮 摄）



⑳ 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校园，钟耀群将端木骨灰撒在当年端木埋葬萧红骨灰的地方。 （吕宗力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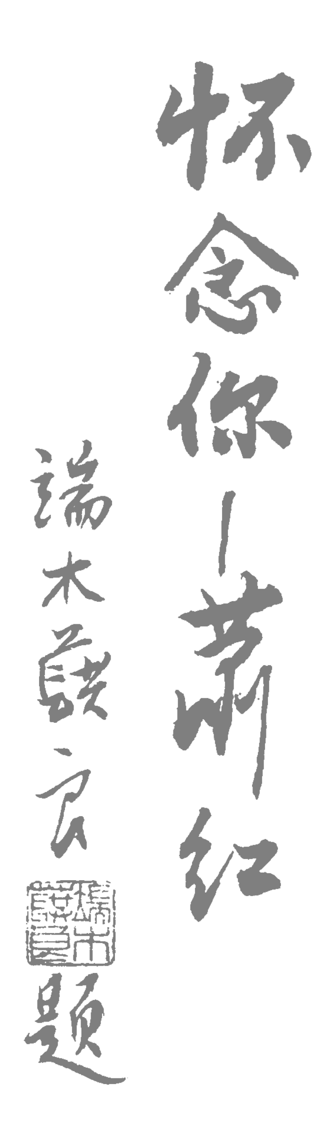


㉑ 参加撒端木部分骨灰的亲友摄于圣士提反女校。（从左至右）刘济昆先生 林薇女士 卢玮銮女士 钟耀群 吴宝琴 梁政老师 苏国珍校长 苏珊娜女士 马庄华老师 曾敏之先生 罗承勋先生 （吕宗力 摄）



㉒㉓钟耀群在香港端木蕻良与萧红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进行凭吊。

（长青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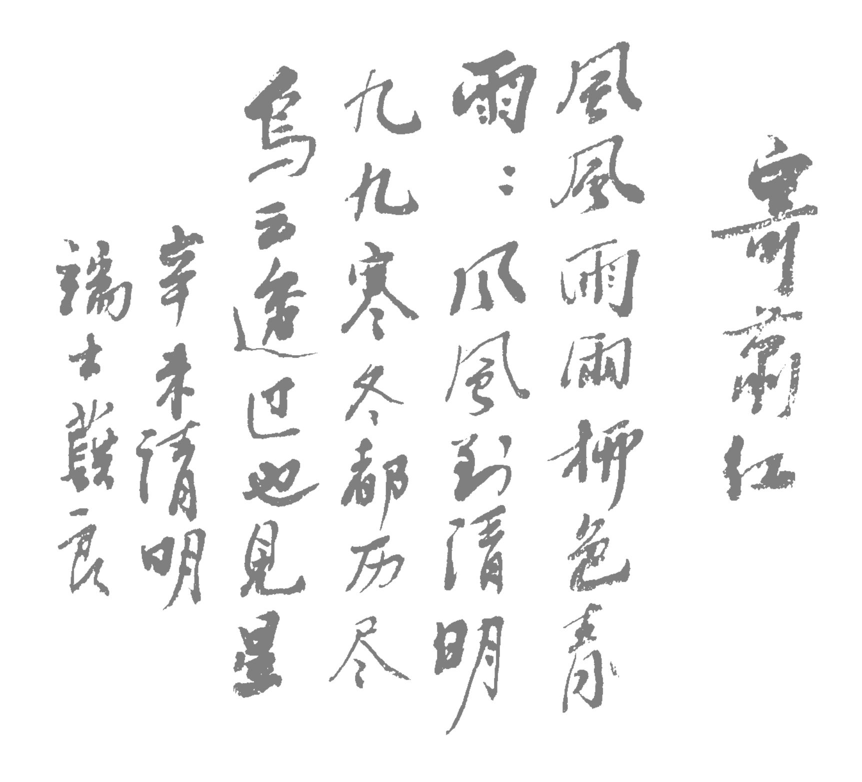


① 端木蕻良为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怀念你——萧红》题写的书名。

只有香如故



② 端木蕻良为《只有香如故 —— 萧红大特写》题写的书名。



寄蕭红

風風雨雨柳色青
雨雨風風到清明
九九寒冬都历尽
鳥云遮过也見星

辛未清明
端木蕻良

①端木蕻良每年清明书写怀念萧红的诗手迹选登。（六篇）

风入松

为萧红扫墓 端木蕻良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镶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匣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经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于广州

③端木蕻良为萧红扫墓而作的诗《风入松》。

挽萧红俚

每年为我鬻银河
今岁为君作挽歌
天上共进桂花酒
吴刚不许再伐柯

辛未清明
端木蕻良北京

无题

无花无酒一灯荧
灵風夢雨打窗櫺
白髮皤今記猶昨
又清明

大澤歸來菰蒲盡
阴霾散去天際青
燈擎欹明油欲罄
夜独醒

一九九二年三月廿九日

端木蕻良

北京前门红顶楼

年年此日是清明
细雨疏帘夜无声
历尽人间生死恨
双肩担石海能平

瑞木颙良

一九九三 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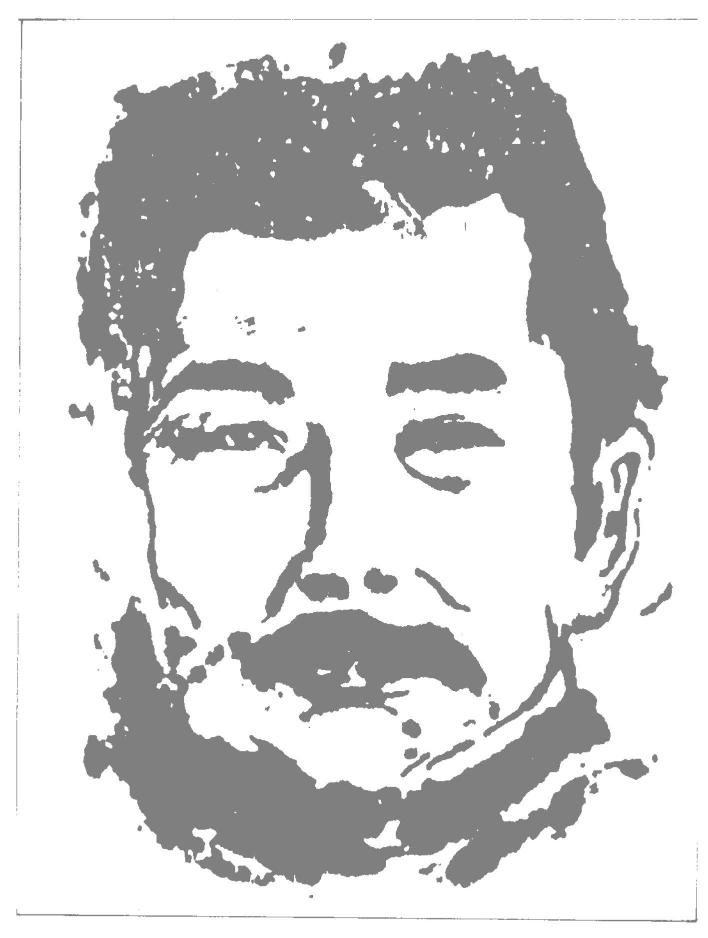
甲戌清明祭萧红

月落夜飞霜，孤鹰绕青庐。水仙祠畔岑枫叶，渡[illegible]深地。鹫州偏哉，天磨石转春，谁解攀携境，梦醒雪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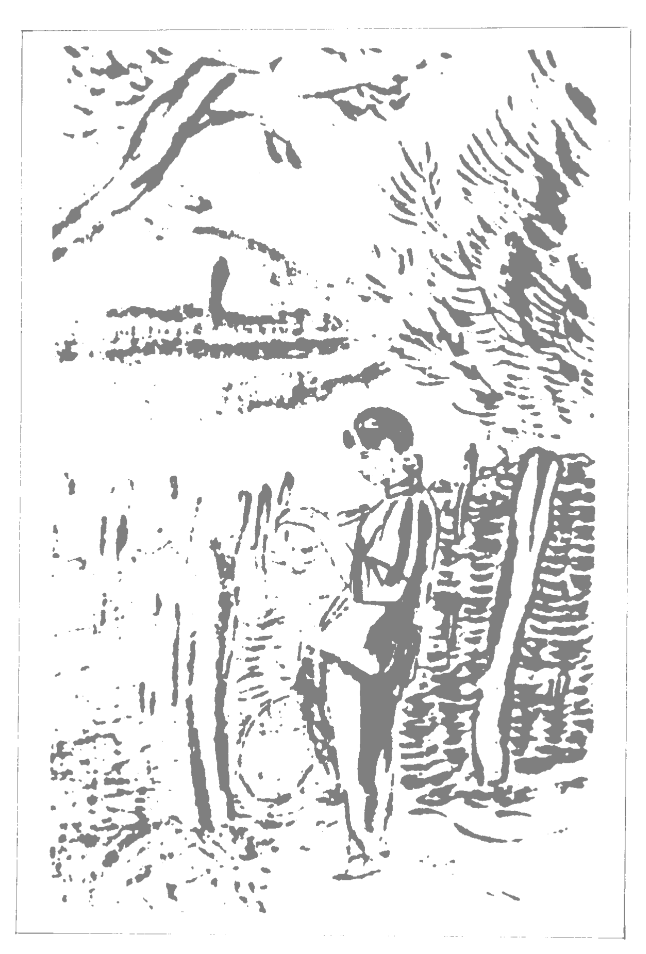
张[illegible]
年方八十二岁

旧作　端木蕻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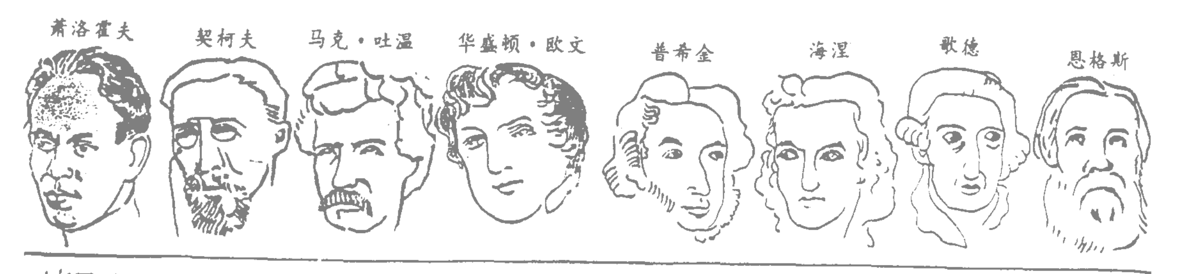
几番风雨是清明
遥落红冰洒红莹
人生如此偏无梦
坐听征鸿一夜声
红冰同曹贯诗意
乙亥清明祭前红



⑤　端木蕻良指绘的鲁迅头像。



⑹ 端木蕻良为萧红小说《小城三月》绘的插图。



⑦　端木蕻良绘制的世界著名作家肖像。

前　言

端木蕻良生前对有人写他和萧红之间的文章多有不实之词，甚至造谣诬蔑，都从来不看，他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来对待。他认为不占用大好时光去进行创作，太没意义了。他计划将《曹雪芹》下卷写完后写《回忆录》，其中当然会写到他和前妻萧红如何从认识、结婚，到为她治病、送终，直至火化、埋葬，他曾对我说，他对待萧红，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端木脑血栓病多次复发，在语言、行动都受到病魔的折腾下，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但是，天不假以年，1996 年 10 月 5 日中午 12 时，他溘然长逝了，他这付未完成的担子，似乎自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本来我是准备将《曹雪芹》下卷完成，再写他的小传，其中当然包括他与萧红的结合。但是，在他去世以后，有的悼念他的文章中，提到他和萧红的关系，仍有以讹传讹的说法在流传，我太不能平静了！于是决定先将《端木与萧红》写出来，因为我也 70 多岁了，如果我不尽快地将端木生前对我谈到他和萧红的一切写出来，那么，那些说法岂不是要以讹传讹永远流

传下去了。我要为端木“平反”！因此，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到女儿给我寄来5月10日经香港到悉尼探亲的机票前两天，写出了初稿。

我是从萧红这个名子进入到端木脑海中开始写的，然后是见面、相交、定情、结婚，共同在武汉、重庆、香港的生活，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端木在战乱中如何照顾病中的萧红，到1942年1月22日上午萧红去世，24日火化，26日晚将另一半骨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校园面向东北方向的一棵小树下为止。

这里我主要凭我和端木共同生活的30多年中，在我有心无心的询问下，端木对我所讲的事实，我是靠我的记忆写出来的，既没有涉及他俩的写作成就，也没有涉及他俩工作中的活动与交往，这些都从年表中来体现了，我主要是写他俩的感情生活，更主要是写端木对萧红的一往情深。我没有见过萧红，我极力避免主观臆测和设想。

相页上，我选用了1938年端木在西安的几张，特别是手拿萧红送他小棍的相片；再就是1985年到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时，我陪端木专门抽出时间，到汉口寻找1938年5月他和萧红结婚的大同酒家，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端木拄着手杖，迫不及待地爬上二楼楼梯口，巡视楼上情景时，我看到他不顾喘息、百感交集的含泪目光，立即抓拍了一张；第三组是1986年去萧红故居，他像孩子一样躺在萧红

出生的炕上，要我为他拍了一张；最后是 1987 年冬，我们去广州银河公墓祭扫萧红墓时，他在黄力的扶持下，跌跌撞撞走到萧红墓地，不顾一切地扑向碑前，用手指揩拭萧红相片脸上的尘土，就像当年他为萧红揩拭脸上的泪水一样，可惜我要朗读他写《祭萧红》的诗，没能拍下这个镜头，深以为憾。

在附件中,我目前仅收集到 90 年代每到清明节，他祭萧红的诗，其他尚未收集到，再就是在 50 年代，在所谓“反胡风”运动中，当时的领导一心要将端木打成“胡风分子”，他都不进行反驳。但领导提到萧红是“胡风分子”时，他却勃然大怒了。这里我选用了当时在场的葛翠琳在悼念端木文章中的一段，来说明端木对萧红的感情。

1997 年 5 月 10 日，我带着端木部分骨灰飞到香港，在端木生前友好热情安排下，于 13 日上午,在圣士提反女校校园面向东北方向的坡上，在端木当年埋萧红骨灰的地方，撒下了端木骨灰，让他俩人间天上、生死长相伴，以了却端木生前对萧红的无限眷恋之情，我也心安了。

钟耀群 1997 年 6 月于悉尼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端木与萧红
作者＝钟耀群
页数＝１８０
ＳＳ号＝１０１７６５７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１月第１版

\ b桎
0 - N齎旍錘\ O禰